

第五屆中、日「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重要文件選輯

上項研討會係於本年三月廿八日至卅一日在台北舉行。中日兩國學者專家六十五人曾在會中以「中國大陸變局的研究」為主題，進行為期四天的切磋與研討；并提出論文十六篇，就目前中共所面臨的內外情勢及其可能發展，詳加剖析，茲特將其中有關中共對外關係之論文三篇，連同開幕及閉幕致詞，併予刊載，俾供參考——編者。

開幕詞

蔡維屏

各位貴賓、各位先生、各位女士：

今天是第五屆中、日「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的第一天集會，本人首先要代表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和中方出席同仁對遠自海外來台與會的學者專家，表示誠摯歡迎之忱。本人要特別一提的是船田中先生此次承允擔任大會榮譽主席，遠道前來參加大會揭幕儀式，我們深深感到光榮和感激。這些年來，船田中先生一貫支持這一個雙邊的學術性會議，鼓勵我們對大陸人民生活實況和中共政權的暴政，作深入研究，及時予以揭發。船田中先生不僅是一位維護正義、自由的學者和政治家，也是中華民國親密友人。我們要表示熱烈歡迎之意。

今天承中央委員會張祕書長在百忙中抽暇蒞會，並將致詞，同樣的給予吾人極大的光榮和鼓勵。我們十分的感謝。

今天應邀參加開幕典禮的，還有很多位黨政首長、教育界、新聞界賢達之士，和來自東京的山崎龍男參議員。都是在公務繁忙的情況下，特來參加，敬此一併致謝。

國立政治大學會對本屆會議多方給予支援，我們要向李校長元簇表示謝意。

這次大會，承日本綜合研究所桑原壽二先生和研究所各位先生大力支持和合作，才能使籌備的工作順利完成，表示由衷感謝。回憶在以往四屆的研討會中，中方和日方的學者們都能够自由的發言，熱烈的討論，這是在中國大陸或是任何共黨地區所辦不到的。我們研討的目的是在了解大陸真相，在觀察大陸局勢動向，換句話說，我們是在求真、在求知，這是我們從事研究工作人們

努力的一貫方針和目的。

最近我們讀到美國霍布金斯大學拉克教授 (Edward N. Luttwak) 訪問大陸歸來的報告，揭穿了中共安排下完全隔離的訪問，對邊疆少數民族的迫害，人民生活之困苦，生產設備的落後，極權控制的殘酷，武器裝備之落後，有些是我們已經知道的，有些遠比我們了解的還要惡劣。最值得一提的是，他認為許多外國記者把顯而易見的偽裝，不加追究，而像傳聲筒一般的替中共宣傳，大吹大擂，忽視事實。他們是顧及再度受邀請的迫切職業需要，或者是要保持留駐中國大陸的飯碗，這些才真是美國新聞界的醜聞。

另一位是作家華騰堡 (Ben J. Wattenberg) 先生，他和拉克教授同是隨同美國前國防部長斯勒辛格在上年九月訪問中國大陸的，他說大陸人民 (一) 沒有言論自由，(二) 沒有職業選擇的自由，(三) 沒有工會組織活動的自由，(四) 沒有國內旅行和出入國境的自由，(五) 沒有提出反對政治意見的自由。中共政權壓迫的結果，使幾百萬人徒步逃亡。

他又說：中國大陸貧窮和落後達於極點，經濟發展情形，遠不及台灣、巴西、墨西哥、南韓、和象牙海岸。

這兩篇報導，給我們一些警惕，那就是說，在千百篇的新聞報導裏，大都受了這些外人很少知道的影響和約束，充滿了虛偽，謊言累累。基此，世人要了解大陸真相，自是難乎其難。因為這個原因，吾人所負荷的責任也就特別沉重了。

從今天起，各位將有四天的集會，可以暢所欲言，以求「真」求「知」，揭發大陸的真相，提供正確的見解，供世人參考，必定是一項極有價值的貢獻。謹預祝會議成功，各位身心愉快。

開幕賀辭

船田中

主席、各位貴賓、出席會議的各位學者、專家先生：

本日舉行第五屆中、日「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本人能以名譽會長身份藉此機會致辭，甚為榮幸。在此向主辦會議的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蔡維屏先生及有關各位先生，表示由衷的感謝。

在本人致辭的同時，不禁使本人想起一九七四年在臺北舉行第三屆會議的情況。當時適值日本片面的宣布斷絕中日關係之時，日中航空路線亦陷於中斷，儘管日中關係非常惡劣，但 貴方對我方出席人員一行，均能表現出自內心的歡迎，並使會議在友好氣氛中圓滿完成。對 貴國之寬宏大量，表示敬意。

在今天的日中兩國關係上，雖然雙方仍未恢復正常，但情況已大為改善，不僅日中航空路線業已恢復，即在經濟、文化等各個

領域中，其交流程度已遠較過去任何時期更爲進步與發展，且到處皆有其跡象可尋。的確值得吾人同申慶賀。貴國此種表現，實爲繼承 蔣介石先生遺志的各位領導者先生的深厚的道義及其遠大的見識所賜，在此一併深致敬意與感謝。

吾人能超越此種複雜的政治環境，不顧一切的連續舉行「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而今天更召開了第五屆會議，本人深感似有一種象徵性的意義。吾人對中共非人道的暴政，彼此有一種共同的正義感，而且根據此一正義感，更產生了使命感。在今天的大陸，隨著毛澤東之死，復又暗雲密布，不安的動盪的現象，益形嚴重。值此吾人舉行本屆會議，可謂適得其時，尤其特別意義。

吾人瞭解此一會議的本來目的爲研究大陸情勢的本質，並進而交換意見，但本人認爲僅此似尚不夠，應透過會議進而建立兩國學者及具有慧眼之士的友誼關係。須知吾人關係發展至今，已成長爲日中團結的一大支柱，並確信此將成爲未來恢復兩國正常關係所不容忽視的基礎，本人由衷祈禱會議之發展與成功的道理卽在此。

在今天的國際政治環境中，請允許本人坦誠的指出，貴國的立場仍相當艱難，但儘管如此，貴國在亞洲仍能毅然堅立，建設一個在亞洲最爲安定的國家，且一天比一天繁榮，蔚爲壯觀，對貴國此一精神力量和智慧，除由衷表示敬意外，更祈願今後能有更大的發展。

以上謹表達了本人個人的意見，並以此作爲賀辭。最後敬祝會議成功及蒞臨大會各位先生的健康。謝謝各位。

開幕致詞

桑原壽二

主席、各位貴賓、各位學者專家：

請允許我在這裏首先向參加此次開幕典禮的各位先生表示我深深的敬意，同時向此次招待我們一行三十餘人參加第五屆日、中「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的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蔡主任及有關的各位先生表示由衷的謝意。

此一會議先後已召開了五次會議，本人從第一次開始就參與策劃及參加會議迄今，的確感慨萬端，不勝唏噓。回顧自一九七一年召開第一屆會議以來的經過情形，儘管貴國方面對歷屆會議均能準備周到，使會議進行甚爲順利，但我們日本方面每隔一年必呈現一種步調紊亂的現象，說起來，非常慚愧。但是，在這裏本人必須加以說明，日本方面所以會如此原因，並非吾人對會議態度消極，而是我們在日本環境條件使然。關於這一點容本人在下面提出說明。目前圍繞我們的日本環境，已經呈現一種好轉的徵兆，本人確信此一趨向，縱然轉換的速度緩慢，但時代確實在改變，則爲不容否認的事實。

換句話說，在初期，也就是在第一屆至第三屆會議期間內，如果在日本對中共提出批評性的言論，簡直等於侵犯了神靈，屬於

忌的，如某人敢於提出正當的言論，必被指為叛逆。在此種特殊環境下能毅然參加此一會議者，本人敢於斷言，其本人必具有牢不可破的志節和堅強信念。在這裏不禁使本人憶起在日中斷交後不久在東京舉行之第二屆會議，當時東京的情況，本人在此不擬贅述，總之，是在非常險惡的環境下所舉行，故就會議本身的意義而言，是對日本政府的決定表現了一種含有濃厚的抗議性質，事實上也不可否認的，我們主辦的每一位同仁的內心確是蘊藏着此種心情。

如前所述，今日日本的客觀條件現已有改變，學者們目前不僅可以毫無忌憚地表達其主張，也能提出並展開他們的正確言論，雖然本人也承認其變化是緩慢的，但最低限度它已成爲潛在的一種趨勢，實爲難能可貴。

在此本人認爲有進一步探討促成此種變化主要因素之必要。第一，無可諱言的是 貴國的繁榮及安定和中共大陸混亂及荒廢，已造成鮮明地對比，因而促成了日本的變化， 貴國的成就不僅是 貴國的成功，就我們第三者而言，且認爲 貴國的成功是具有國際性的。因此，我們由衷的祈願 貴國之成功，更能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第二是中共大陸不斷的政治混斷以及其在經濟上陷於絕望的停滯、貧困，因而人心陷於不安和動搖。換句話說，中共的真相，已爲日本一般社會逐漸瞭解和認識，因此，對某一部分輿論所報導的歪曲事實和有用心的操縱，開始採取不信任的態度，而且正有逐漸擴大、普遍化的趨勢。

在此次召開第五屆會議之際，最使本人深深感觸者，就好像我們每屆會議都是配合中共發生大混亂而舉行的。誠然，中共的混亂、動搖已成爲家常飯事，永無停止之日，但最巧的是去年舉行第四屆日中會議中，北平發生天安門事件，當時使本人深感中共問題的關鍵所在，派系對立尙屬次要問題，而廣大社會動向成爲主要問題。從李一哲的大字報到杭州事件；從杭州事件到天安門事件，其發展和擴大以及問題所在的根本的關聯性，究竟是什麼？相信不外是集中反映了大陸人民渴望自由，渴望擺脫貧窮。換句話說，它們表現了大陸人民對現行體制的憤怒和他們的抵抗的意向，在大陸內部似已匯集成爲一股潛在的強有力的力量。故本人認爲歷史現已接近轉捩期，不知此一看法是否適當。

在毛澤東與中國社會的矛盾正達於極點時毛澤東竟告死亡，而中共政權又進入華國鋒時代。雖然吾人不能否認此一政權的存在，但它是個軟弱的政權，此一虛弱的政權與前述的中共社會不穩的動向將發生何種相互作用？將發生何種變化？其變化將爲國際政帶來何種影響？在面臨如此重大問題時，我們恰好配合此一情況召開第五屆會議。在此意義上，此次會議確實是一項歷史性會議。

總之，「中共將往何處去」這一個問題，現已換上新的外衣，而成爲當前的主題。對 貴國而言，此一問題上，應爲最切身的問題，而且 貴國的研究成果必較他人更爲深入，更具真實性，我們所期待的亦在此。不過，我們因站在純粹第三者的立場，相信我們的意見對 貴國也將具有若干參考之處。

最後願透過此種會議機會，進一步擴大彼此之友好互助關係，以因應此一歷史的變動。謝謝各位！

開幕致詞

張寶樹

主席、各位貴賓、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今天第五屆中、日「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在台北舉行，寶樹承邀出席致詞，深感榮幸。茲代表本黨首先向出席這次會議的各位專家學者，特別是自日本遠道來台的各位貴賓，敬致歡迎之意。同時也要向這次大會的主辦單位蔡維屏先生所領導的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深表敬意。

寶樹深深的感覺到，當前國際形勢，不管情況是怎樣的複雜，變化是怎樣的詭譎，但基本上今日國際上的一切鬥爭，仍然是自由與奴役，民主與極權的鬥爭，這一鬥爭的最終結果，不僅是關係着某一個國家的命運，而是關係着整個世界與人類的命運。從這個角度看，今日研究中國大陸問題，不僅有著現實意義，而且有著更為長遠的歷史意義。因為中國大陸問題，已不是中國一個國家的禍福問題，而且是一個有關亞洲安全與世界和平的保障問題。沒有中國大陸的赤化，不會有韓戰，不會有越南、高棉、寮國淪陷，也不會有今日東亞與西南亞所面臨的種種緊張情勢。我們都知道，今日中共內部正面臨著無數的困難，可是就在這種困難情形之下，中共仍然不放棄它發動「世界革命」的妄想，不放棄它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事實上也未放棄它「反蘇修」、「反美帝」、「反各國反動派」的「三反」路線。在它的這些野心和路線之下，它以「反對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為藉口，一面分化自由世界破壞自由世界的友好團結；一面更向世界各國或明的或暗的進行滲透顛覆活動，及輸出「人民戰爭」和「槍桿子裏出政權」的毛澤東式「共產革命」思想，這就是今日亞、非、及拉丁美洲若干國家，若干地區不斷發生流血動亂不安原因之所在。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中共為什麼要這樣做？這是它共產主義的本質所決定的，共產主義制度內部必然有一種內在的因素促使它非向外發展不可，促使它無法與自由世界在和平狀態之下共享民主自由的陽光。寶樹希望各位專家學者，運用各位的智慧，運用各位的學識與遠見，儘量探究出中共這些本質與內在的原因，儘量揭露中共的真面目，使自由世界的政治家、外交家以及各界人士，借重各位所提供的卓見和議論，在與中共交往的時候，能够提高警覺，識破陰謀，不為中共一時一地口蜜腹劍的統戰伎倆所矇蔽，那就是各位先生對人類的幸福，世界的和平，提供了不可估計的偉大貢獻。

中國大陸之淪於共黨，原因甚多，但是當時國際惡勢力的加工製造，與中國早期知識份子對共產主義缺乏認識并受其誘騙利用，實為其重要原因，中國的傳統文化、社會結構與經濟發展，無一不與共產主義相抵觸，中共強將共產主義推行於中國大陸，基本上那只是一種惡性的實驗，二十八年來中共統治大陸的過程，實際上也就是不惜代價以中國大陸人民的鮮血試驗共產主義的過程。

今日我們可以很客觀的、平心靜氣的說，二十八年來中共血腥的實驗已經不斷遭受挫折和失敗，目前已瀕臨全面破產。

概括來講：中共竊據中國大陸，一開始就用流血鬥爭的手段，強行所謂「土地改革」，消滅地主、富農；同時還用殘酷手段推行所謂「三反五反」、「思想改造」、「鎮壓反革命」等暴政，迫害了無數的人民。五十年代中期，中共又用「三大改造」的名義通過「農業合作化」、「私營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等形式，消滅了廣大人民的「個體農業」、「個體手工業」和「私營工商業」。人民對中共這些暴政的答覆是：全國工人、農民的騷動，知識青年在北平發起的「新五四」反抗運動，以及高級知識份子在大鳴大放」中公開表示厭惡或反對的態度。中共則是以殘酷的屠殺和「反右派」運動，去鎮壓人民的不滿，勉強維持其統治。但却造成了更大的矛盾和更多的困難。

一九五八年中共推出了所謂「三面紅旗」的種種暴政，這時人民的反抗雖遭受殘酷的鎮壓，但中共內部的不滿却造成了它組織的分裂，迫使毛澤東不得不發動臭名昭彰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以毀「黨」、毀「憲」的手段，造反奪權，其結果是毛澤東雖保住了自己的權位，但在中共黨內已當權了十七年之久的劉少奇，却被指為「叛徒、內奸、工賊」，以承擔整個十七年來失敗的罪責。以後又清除了爲他奪回權位的「副統帥」林彪，推出了「批孔揚秦運動」以及所謂「社會主義新生事物」，及「下放」造反奪權有功的知識青年等措施，不斷整肅他的政敵和功狗，不斷迫害大陸的人民和知識青年。但這些只能造成大陸人民與中共內部更大的更多的矛盾、不滿與反抗，去年北平天安門羣衆抗暴行動就充分的說明了這一點。

現在中共的新當權派，又把「文革」以來一直當權的所謂「四人幫」加以打倒，使之作爲其暴政的代罪羔羊。過去「四人幫」一貫罵他們黨內的同僚是「叛徒」、「投降派」、「走資派」、「修正主義者」，現在他們自己却被他們的同僚扣上了這些同樣的罪名。

這一切，看起來是多麼荒謬、矛盾，令人不能理解，可是我們如從中共統治大陸的全程來看，就可清清楚楚的了解，中共內部爲什麼會這樣動亂不安，是非顛倒，反覆無常？這是共產主義在中國根本行不通的一種結果，人民不接受它，多數中共幹部也不接受它，中共不擇手段的反覆掙扎，而掙扎的結果都是一次接著一次的失敗。

由於中共不斷的自我暴露，使大陸人民澈底認清中共政權反人民、反人權、反人性的本質；就連它的黨員幹部也不再相信黨的領導的正確和正義，對共產主義前途也喪失信心。正如廣州李一哲大字報所說：今天的中共，祇是少數特權階級的統治，他們之間爭來爭去，祇是在爭誰享有這份特權。實際上，毛澤東、江青的共產暴政與周恩來、華國鋒、鄧小平的共產暴政，在反人民、反人權、反人性的本質上是沒有什麼差別的。

中共這樣心毒手辣，毫無理性的在中國大陸從事共產主義的實驗，使我國大陸同胞所付出的慘重代價，真是史無前例。我誠懇地向在座的各位專家學者呼籲，願從中日兩國國家和人民的立場來說句公道話，我們都有責任發揮知識和道德的力量，認清中共，

進而消滅中共，迅速結束中國大陸人民在水深火熱中的苦難，才能維護兩國長遠的安和樂利與民主自由，同時，也只有如此，才能進而協助自由世界各個國家避免重蹈作爲共產主義實驗的災禍。

各位貴賓、各位專家學者們：過去四屆中日合作進行的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對促進認識中國大陸問題和提高研究水準來講，確已有了卓越的貢獻。敬盼各位運用豐富的經驗、敏銳的觀察與卓越的判斷力，在這次大會中共抒高見，洞燭和揭露中共的種種罪惡與危機，重視和瞭解大陸八億人心的轉變和向背，并使全世界人士能有共同的正確的認識，寶樹深信蒙受其恩惠的，當不僅僅是我們中日兩國的人民而已。最後，謹以至誠的心情，敬祝大會成功，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健康愉快！

閉幕詞

蔡維屏

桑原團長：各位先生：

在過去的四天裏，各位曾把經年累月所蒐集的資料，公諸同好，作爲大家共有的資產，各位也將深思熟慮的見解，一一發表，以爲共同切磋的參考。這是以衆志成城的心意，以達成學術研究——求「真」求「知」的目標，深值欽佩。本人相信各位此次研討的結果，是會受到各方重視的。

這次我們研究的主題是「中國大陸變局的研究」。經過四天的詳盡的討論以後，我們對大陸現狀獲得深度的透視，對大陸局勢今後的演變，也找出了一些重要的線索。

一、在黨政方面：毛澤東對於繼承的安排，是澈底的失敗，因而註定了他身後所發生的繼承權的尖銳鬥爭。第一回合的結局是「四人幫」被整肅，而文革派并未被剷除；是華國鋒和部分老幹部及軍人實力派組成了一個基礎脆弱而控制力局限於北平四週的過渡性政權，未能把局勢穩定下來。目前面臨的鄧小平復出問題，已構成華國鋒政權內部的意見紛歧，無論鄧能否挾部分軍方支持衝出來或者竟而碰壁，都會把奪權鬥爭表面化而產生一個新的高潮。

二、在政策路線方面，處處是難題，使華國鋒一羣不知何去何從。是重提「論十大關係」還是追隨「不斷革命論」？是加強對軍區的控制抑聽任軍權膨脹黨權式微？是繼承毛澤東文革路線抑解放兩度被整肅的幹部而全盤否定文革？是繼續自力更生抑加速引進外國技術？

三、在經濟方面：除了政策路線而外，面臨農業生產萎縮遍地飢荒，要大量輸入食糧。爲緩和農工民衆的不滿和反抗，又必需增加日用品的供應。在生產落後，資金短缺，收支逆差擴大，地方動亂頻仍的情況下，一切唯有寄望於石油。但石油的生產與輸出

，眼見無法作大幅度的增加來承擔這樣沉重的負荷，以致任何措施，都捉襟見肘，所以中共目前的經濟計劃，顯將落空。

四、大陸工資凍結多時，而農民收入尤低，多年來中共實施饑餓輸出，早已使人民衣食不週。於是發生普遍的生產情緒低落，反抗暴政呼聲載道，天安門事件便是民衆赤手空拳的抗暴行動。「欺騙」無效，「鎮壓」失靈，因此造成各地的動亂，而且有持續甚至擴大的趨向。

五、在對外關係方面，華國鋒除了高唱繼續毛的「革命外交路線」而外，已無力作任何新的策劃。(甲)和蘇俄的意識形態的對立，進而為國家利害的衝突，這形勢將長期持續。(乙)對日關係，亦難開展，原因是日本朝野對大陸狂熱期已過，正進入了反省期，理解了東北亞過去和未來的安全均繫於日美、美韓和中美的共同防禦條約，而維持目前亞洲均勢為當務之急，對蘇俄和對中共尤其主張保持適度距離，所以堅決反對霸權條款。(丙)中共希望對美國關係有突破性的進展，已漸消逝，因為它所望於美國者為拋棄中華民國，撕毀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美國無法辦到，它不願見美國與蘇俄協調而同時高舉「團結第三世界」和「反霸權」旗幟，也使美國却步。

此外，各位在論文中，評論中，和公開討論中，也有許多值得世人深省的寶貴意見，它們破除了許多混淆聽聞的謊言：

一、大陸銳意增加石油輸出，困難重重，它需要濬深港口，擴建碼頭，更新設備等，決非當前財力所能負荷，所謂八十年代將取代阿拉伯原油之說，不攻自破。

二、大陸政治不安定，社會秩序混亂，生產無法增加，已足使熱中促進與中共貿易人們逐漸醒覺。

三、天安門事件是中共多年強制實行社會改革與事事採取高壓手段所引起的反抗，是羣衆的怒吼，並非偶發的事件，也不是擁周擁鄧運動。

四、所謂實用派當權後，可獲軍方支持，改變毛澤東路線，從事改善經濟情況，屆時將歡迎自由世界資本技術等，全係臆想，并無根據。從各軍區軍人實力系統的複雜性與彼此間長期恩怨情形以觀，地方力量的抬頭和新型割據的逐漸形成，為今後大陸政局的趨向。

各位先生：以上是本人從四天會議中所聽到的，所領會的，都是研究大陸問題人們極具價值的參考，也足供與亞洲安全有關各國當局的鑑賞，如果本人幸而言中，則將為本屆大會重大的貢獻。

大會即將告一段落，但大陸局勢在動盪中，在劇烈變化中，吾人意見的交換、知識的融通，不能等到一年後下屆會議的召開。船田中先生在開幕時說過：參加研討會的各位學者，是今天中日人民團結的主力，是他日中日兩國復交的基石。因此我們歡迎日本學者們近期內能再度來訪，不吝指教。

謝謝各位此次熱忱參加大會，謝謝各位對大會的貢獻。敬祝各位旅途愉快，事業成功。

閉幕致詞

桑原壽二

各位貴賓、各位代表！謝謝各位先生的光臨。

我們開完了四天的會議。當要致閉幕詞之時，本人深有依依不捨之感。

首先爲這次研討會能圓滿的完成整個議程，並且很有效地達成任務，特向主辦單位致賀。同時，我們也由衷地感覺興奮。這些成就，完全是由於事前已有了周全的準備和精密的計劃，特此向蔡維屏先生致十二萬分的敬意。同時，對於有關部門的各位先生對我們誠懇的接待，表示謝意。

因爲我們雙方的習慣不同，語言各異，想必有許多失禮之處。但由於我們是觀點相同，立場一致，諒能獲得原諒。

我們的研討會是追求一項真理和真實的學術性會議，因此見解的不同，意見的對立，是在所難免的。這樣才能取長補短，才能獲致成果與友誼。就這種觀點而言，本人確信，這次研討會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樹立了新的里程碑。本人切望，今後仍繼續共同勉勵致力於這一研討會的進一步發展。

本人在一九七四年第三屆研討會的閉幕詞中，因受到 貴國強烈的印象，曾用「悠然、毅然、斷然」六個字加以概括表達。如今經過三年，本人深深感覺到 貴國正充滿信心向着大目標，以堅定步伐向前邁進，內心深感欣喜。

如果我們把視線轉移到中國大陸，正如我們在這次研討會上所討論的種種，中國大陸正呈顯着中共慣用之「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情勢。在這種情勢下，「悠然、毅然、斷然」的六個字中，這個「斷然」兩個字已經成爲時代的主題，它必定會扮演更大角色。所以，本人更祈望 貴國的更大努力和奮鬥，同時也相信這次研討會對於今後有所裨益。

貴國領導人嘗指出：「對於友人的物質援助，固然感謝，但是友人的對我國的立場和目標的了解和同情，對我們而言，更是有鼓舞和激勵的作用。」我們學者、專家所能做的，也就是這一點而已。就今天來說，我們當會把這次研討會的成果帶回日本，把貴國的立場和目標向日本朝野作廣泛的啓蒙和宣傳。我們當會盡最大可能來擴大對 貴國了解的範圍。我們希望除這個研討會以外，另有比較小規模的交換意見和互相啓發的機會，作爲加深互相了解的另一途徑。我們的這種小意見如能被採納，則深感榮幸。本人簡單地提出上述一些感想，以作閉幕詞。謝謝！

現階段中共與美國關係之演變及其可能之發展

陳裕清

一九四九年正月月中旬徐州會戰結束之後，紐約時報的社論曾謂：「一個對西方世界具有不可預見之嚴重影響的大悲劇，正在中國發生」^①。一月廿五日，當時身任美國眾議員的甘迺迪總統，則在眾議院中大聲疾呼：在過去這個週末中，我們業已瞭解，由於中共在大陸上軍事的勝利，中美兩國所遭逢的悲劇，是何等的重大！我們在遠東外交政策的慘敗，責任全在白宮和國務院的身上，我們眾議院現在應該擔負起防止亞洲赤化的大責，中共之席捲大陸，不獨是中國，確也是整個西方世界的悲劇，但是整個亞洲並未赤化，中國的反共鬥爭，仍在繼續之中，美國是否克盡其防止亞洲赤化的大責重任，却是一個重大的疑問。

一九七二年二月廿七日，尼克森總統結束其北平的訪問之後，揚言他在大陸一個星期的訪問，改變了整個世界，而所謂整個世界的命運，也就操在美國與中共的手中。事實上，尼克森總統雖然打開了中共的「竹幕」，但不獨沒有改變整個世界，也沒有完成美國與中共之間關係的正常化。現在民主黨的卡特政府，正在積極檢討其對中共的策略，並且一再強調不變「關係正常化」的目標；中共華國鋒的新政權，固然忙於鬥爭「四人幫」，其追求對美建立外交關係的企圖，必也加緊進行之中，惟以中共與美國之間，固已喪失甘迺迪總統在眾院時期的強烈敵性，然其一時戰略利益上的局部一致，却也難以掩蓋彼此思想觀念、價值標準和基本國家利益的歧異，所以美國與中共關係的發展，在可預見的將來內，必將仍是沒有對抗衝突，也沒有充份正常化的僵局。

中共所謂革命外交的陰謀

中共與美國關係之久成僵局，實是中共所謂革命外交路線靈活運用的必然結果。

中共自詡是正宗的馬列主義者，馬列主義者的外交理論，基本上就是確認外交乃是世界規模奪權鬥爭的工具，其目的在於團結全世界的無產階級，戰勝資本主義者，促成全球的赤化^②。在這個基礎上發展的中共外交路線，更是具體積極而富於鬥爭性和陰謀

^① 紐約時報，一九四九年一月廿四日。

^② 參閱Levi, W., *Modern China's Foreign Policy*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53); *The Theory of Communist Foreign Policy*.

性。毛澤東自己曾經強調：「按照唯物辯證法，矛盾和鬥爭是永遠的，否則不成其為世界。無產階級的政治學說，「共產黨的哲學就是鬥爭哲學」。又說：「整個社會主義階段，存在着階級和階級鬥爭，這種鬥爭是長期的、複雜的，有時甚至是激烈的」^③。所以鬥爭才是中共革命外交路線的基點，以鬥爭來達成赤化世界的最後目標。毛澤東的企圖，是要資本主義在地球上絕種：「有人說我們太沒有良心了，我們說馬克思主義者對資產階級的良心是不多的，在這方面良心少一些才好，我們有些同志太仁慈了！我們要使資本主義在地球上絕種，使資產階級成爲歷史上的東西，這是很有意義的，是一件好事情」^④。爲了消滅資本主義，毛澤東一方面對內積極備戰，對外多方煽動叛亂，另一方面則直接的或間接的支援各地區的所謂民族解放戰爭^⑤。他說：「我們中國不僅是世界革命的政治中心，而且在軍事上、技術上也要成爲世界革命的中心，要給他們武器，就是刻了字的中國武器（除了一些特殊地區），也就是要公開地支持，要成爲世界革命的兵工廠」^⑥。但是如同所有的馬列主義者，毛澤東也認定統戰乃是鬥爭的另一種方式，易言之，共產黨的鬥爭，不論是在一國之內，或是在世界的規模上，其策略或技術，都是曲折的多變的，且有充份的彈性，中共年來在國際上的笑臉攻勢，及其對於美國態度的轉變，當然都是外交上統戰策略的運用。

所謂統戰，在中共的語意上，就是聯絡次要的敵人，打擊主要的敵人，聯絡明日的敵人，打擊今日的敵人，另一方面根據毛澤東自己的解釋，也就是：「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有拉有打，拉中有打，打中有拉」；「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⑦。毛澤東對日本的態度，也就是統戰策略的典型運用，他曾向日本的訪客，鄭重表示感謝日本「爲了奪取全國政權，我們準備了好多年，整個抗戰都是準備」。同時却全力煽動「日本革命」，號召日本「走社會主義道路」，「把帝國主義，壟斷資本埋葬到墳墓中去」^⑧。可見中共所謂革命外交路線，不論如何千變萬化，總是自我中心的，其企圖莫不是發展共產的勢力，加速世界赤化的過程。

毛澤東已死，但是毛澤東的思想與策略，仍是中共國際政策，尤其是外交路線的指導原則。中共中央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國務院與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在毛死後所聯合發表之「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書」中，堅決而「莊嚴宣佈」：

「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一定要繼承毛主席的遺志，堅持我黨的基本路線，堅持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線和政策。毛主席親自制定

③ 毛澤東思想萬歲（一九六九年八月）頁三〇八及四〇七。

④ 同上註，頁十四。

⑤ Van Natta, P., *Revolution an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頁七十七至一八五。

⑥ 同註④，頁六八一。

⑦ 同上註，頁五八三。

⑧ 同上註，頁五三三，五三六，五五一。

的革命外交路線和政策，過去是，今後也永遠是照耀我國對外工作勝利前進的燈塔。中國政府堅定不移地繼續貫徹執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線和政策，着眼於人民寄望於人民，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永遠不稱霸，永遠不做超級大國，我們要加强同國際無產階級，全世界被壓迫民族，被壓迫人民的團結，加強同一切受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侵略，顛覆、干涉、控制和欺負的國家的團結，結成最廣泛的統一戰線，反對帝國主義特別反對蘇美兩個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

華國鋒政權所繼承、所要堅決執行的革命外交路線，實際上無非就是世所週知之「反帝、反修、反各國反動派」的三反路線，所謂反帝就是反美，反修就是反俄，反各國反動派，就是反一切反共和非共的政府和勢力，中共的國際策略如此，美國與中共關係的調整，自要着眼於這個政策的策略與理論的基礎。

美國戰後對華的傳統政策

中美兩國重洋遠隔，但皆熱愛和平，崇尚民主與自由。歷史的友誼深厚，人民的交往頻繁，實是自然的盟邦(National Ally)。然在一九四九年間，中共控制中國大陸大部份地區後，美國乃發表所謂對華關係白皮書，預期中國的赤化，將是無可避免，對於中華民國抱持一筆勾銷的態度。當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國務院發表的備忘錄，以及次年一月五日杜魯門對華政策的聲明，其基本的立場，亦與此無異。杜魯門總統的聲明，並曾強調，美國對於駐防臺灣澎湖的國軍，將不提供任何軍事的援助，而當時中美之間，仍具正常的外交關係，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却拒絕隨同中國政府遷駐廣州，美國當時對於中共的偏向與期望可以概見。國務卿艾其遜且曾正式宣佈，美國在太平洋的防線，係自阿拉斯加的阿留申羣島起，經日本琉球，以迄菲律賓^⑨。臺灣和南韓，皆不在內。國務院並已準備追步英國的後塵，對於中共予以外交的承認^⑩。所以美國政府對於中共政權，自始即是非敵性的，善意的，甚至是友好的，只在韓戰爆發，中共宣佈一面倒，倒向蘇俄之後，美國與中共才成敵對與對抗的關係，因此縱是費正清教授，也認冷戰期間，中共在思想意識上，是反美，以美國為敵的^⑪。中共既以美國為敵，破壞東北亞和東南亞的國際秩序，威脅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國家利益，美國乃以冷戰期間的圍堵策略，加諸中共身上。此種策略儘管其表現的形式，時有不同，然在本質上，均不超越維持中國國家分裂的現實，圍堵共產的勢力，侷限在共產控制的地區之內。易言之，實也就是所謂「兩個中國」政策的靈活運用，因此，

⑨ 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二日艾其遜在華盛頓全美記者俱樂部演講，全文見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Jan. 23, 1950, pp. 111-118.

⑩ Kubeck, A., *How the Far East Was Lost: American Policy and the Creation of Communist China, 1941-1949* (Chicago: H. Reguery Co., 1963) pp. 425-430.

⑪ J. K. Fairbank, *Chinese American Interactions: A Historical Summar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76.

就在韓戰最危急緊張的關頭，美國也並未支援中華民國光復大陸國土的目標^①。在韓戰之後，以迄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尼克森總統訪問北平之前，美國的對華政策及其措施，有關中華民國部份是：

一、維持中美之間的傳統友誼，尊重中華民國政府的合法地位。韓戰以後，美國政府曾經一再強調其與中華民國的傳統友誼；對於中華民國在大陸時代所舉行的選舉，以及根據此種選舉結果所組織的政府，加以尊重，並以之作爲交涉來往的對象，易言之，中國政府遷臺之後，美國並未全盤否定其法統。

二、協助確保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及其他國際組織中的席位。一九六一年以前，美國協同中華民國以及其他友邦，運用「緩議」的方式，維護中國在聯合國的席次；一九六一年以後，則以「重要問題」的策略，防阻中共之參加聯合國。同時對於其他國際組織，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民航組織等，美國亦莫不全力打擊牽引中共入會的企圖，確保中國在國際社會上的地位。

三、協防臺灣澎湖地區。美國協防臺灣，具有條約的規範，且有國會特別授權案（一九五五年一月廿九日國會兩院通過之臺、澎協防授權案）的根據。至於金門、馬祖，美國是否亦加協防呢？則由美國總統按照實際的情勢，另作決定，如果中共侵犯金馬，是其進攻臺灣的先聲，美國便將予以協防。

四、經濟援助中國，協助中國經濟的建設。韓戰爆發以後，以至一九六五年經援結束爲止，美國對華經援的撥款，共達十五億美元，促成中國經濟的繁榮與社會的安定，使臺灣逐漸完成工業化的過程，而與中共控制的大陸，形成強烈的對比。

美國對華政策有關中共的部份，其重點計有下列三端：

一、軍事的圍堵。對中共勢力的擴張與侵略，協同友邦，採取必要的軍事措施，加以有效的圍堵，逼使中共的勢力，特別是軍事力量，困處於中共現有控制的地區，不得輕越雷池一步。美國與亞太盟邦簽訂多邊或雙邊的共同安全條約，在重要的戰略要區，設置軍事基地，部署美軍，其主要的的作用，即在於此。

二、政治的孤立。一方面阻止中共參加聯合國及其他國際組織，將中共排斥於國際社會之外，另一面則直接的或間接的勸阻美國的友邦，莫與中共建立外交的關係，限制中共對外的影響。而其禁止美國人民訪問大陸，拒絕與中共進行教育與文化的交換，亦在加強對中共政治的孤立。

三、經濟的封鎖。對於中共實施長期的禁運，不許美商與中共從事貿易與商務的往來，同時也要求其盟邦，勿以軍用物資資助中共，俾使中共的經濟，無法發展，其軍事的實力，無法擴張，以穩定亞太地區的局勢。

^① 艾森豪將軍就職總統後，曾經解除前總統杜魯門對第七艦隊防止國軍襲擊大陸的限制，但國務卿杜勒斯却立即飛赴倫敦，親向艾登外相保證，艾森豪此舉仍在維持臺灣海峽的現狀，並無任何侵犯大陸的企圖。見 Dulles, F. R., *American Policy Toward Communist China: The Historical Record, 1949-1969* (N. Y.: Thomas Y. Crowell Co., 1972) 頁 1111—1111。

美國這種圍堵中共，維護臺灣海峽現狀的對華政策與措施，在六十年代的後期，由於國際權力關係的演變，核子武器平衡情勢的形成，與越戰的長期困擾，乃即不斷動搖，對於所謂中國問題，現實主義與姑息主義的言論與主張，益形囂張，於是「圍堵政策」，變成「圍堵而不孤立」。尼克森當權，世界進入七〇年代之後，美國的對華政策，便踏上與中共所謂「關係正常化」的途程了。

中共與美國何以改變其敵性的關係

中共與美國關係的演變，當然不是任何一方片面的構想，而是國際權力關係的調整，彼此內政外交上的要求，以及雙方若干國際策略上利害的一致等因素所促成。

七十年代之後，由於越戰的曠日持久，中東紛爭的忽張忽弛，國際經濟情況的不斷惡化，西方聯盟的支離破碎，漸使華府負責當局確認，以「美國方案」解決國際難題的時代，業已結束，美國不能再為世界的警察。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傅爾布來德，曾以「權力的傲慢」(The Arrogance of Power)為名，著書指責美國在世界規模上權力的衰退與濫用，甘迺迪總統的副國務卿保爾，在其所著之「權力的紀律」(The Discipline of Power)一書中，也認美國的國際義務，實已超越其國力負擔的範圍，美國必須重新檢討其外交的措施，收縮其國際的義務^⑬，尼克森總統自己，在其當選總統之前，即已深感美國在亞洲的義務，過於龐大深重，必須大力削減^⑭，故其就職總統以後，不獨強調國際關係上衝突對抗時代的結束，談判協商時代的來臨，並且發表所謂關島或尼克森主義，一方面主張美國應自亞洲，特別是亞洲大陸逐漸擺脫，同時則提出對中共和解的暗示^⑮。

根據季辛吉國務卿的老友斯多辛吉表示，尼克森就職總統一星期後，就書面指示當時身任國家安全特別助理的季辛吉，研究與中共和解，調整與中共關係的可能性^⑯。蓋尼克森認為，美國的民意和輿情，顯已不願繼續承擔國際警察的義務，蘇俄的核子武器，將與美國等量齊觀，越戰的負累，難以解脫，亞太地區的局勢，無法穩定，若能與中共和解，改善美國與中共之間的關係，則可抑制蘇俄，逐漸結束越戰，加強對日的關係，對抗蘇俄勢力在南亞和東南亞的發展，從而穩定整個亞洲的局勢。所以美國與中共關係正常化的促進，在美國政情的要求，與國際政治策略的運用上，便在步步發展中^⑰。

⑬ 當年反越戰的自由主義者，幾乎皆有此類似的主張。

⑭ 見其在一九六七年十月份外交季刊所發表之「越戰以後」專文。

⑮ Hinton, H. C., *Three and A Half Powers: The New Balance in Asia*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 178-179.

⑯ Shoensinger, J. G., Henry Kissinger: *The Anguish of Power* (N. Y.: W. W. Norton & Co., 1976) pp. 116-117.

⑰ 制俄的因素，尤為重要，一九七〇年七月一日，尼克森曾告新聞記者斯密德(H. K. Smith)，其對中共關係改善的努力，主要目的乃在牽制蘇俄，見 Hinton, H. C., *Peking and Washingto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and the United States* (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1976) pp. 34-35.

中共方面，當時所謂文化大革命告一段落，周恩來等官僚派的勢力，並未根本動搖，而蘇俄的軍事壓力，不斷增強，美國的圍堵的防線，依然存在，內部的經濟衰退，科技的發展遲緩，政治的情勢，也仍在動盪不安中，處此困境下，毛澤東和周恩來遂乃運用所謂革命外交策略，在國際間展開笑臉攻勢，對美國進行「乒乓外交」，一反「仇視美國」「鄙視美國」和「蔑視美國」的反美故態，其主要的企圖，顯在：

一、對抗蘇俄軍事的威脅。一九六八年俄軍入侵捷克，鎮壓捷克的自由化運動，宣佈所謂「布里茲涅夫主義」，倡導共產國家有限主權論，同時增兵中共的邊境。珍寶島事件後，蘇俄部署中共邊界的部隊，超過一百萬人，在國際間策劃建立「亞洲集體安全制度」，期在亞洲國際社會上，孤立中共。宣傳上則漫罵中共，指責中共為蘇俄最大的敵人，製造仇恨中共的情緒，中共對此，自感重大威脅，其拉攏美國，當在挾美國以自重，牽制蘇俄，減低蘇俄軍事進攻的可能性。

二、分化美國與盟邦的關係，孤立中華民國，期以達成「解放臺灣」的戰略目標。中共始終認定中華民國的存在與發展，是其本身生存的最大威脅，但中美友誼深厚，具有共同防禦條約的關係，中華民國本身，也擁有現代化強大的國軍，故其「解放臺灣」的夢想，迄難實現。中共現在改變策略，由反美而親美，破壞中美的關係，逼退臺灣和臺灣海峽地區的美軍，而使中華民國陷入孤立無援的困境，俾以政治的方法，完成「解放臺灣」的夢想，實係其基本的陰謀。

三、爭取美國經濟與科學技術的援助。中共的經濟，經過大躍進的挫折，「文化大革命」、「批孔批林」等的不斷鬥爭，幾成癱瘓的狀態，不論是民用或軍需工業，均無重大進展之可言。其科技的水準，尤是低落，而今日具有資助中共之能力者，唯有美國，尼克森訪問大陸後，中共之一再向美購糧買機，套取科學與技術的新法，即可見其企圖之所在¹⁸。

四、掩飾內部鬥爭的混亂，維持其大國強權的虛聲和表象。七十年代以後，中共全面的「文化大革命」雖告結束，但其內部奪權的鬥爭，不獨並未停止，而且愈演愈烈，人民反共抗暴的運動，亦更普遍而深入，此時邀請美國的國務卿、總統和其他名流權要，不斷訪問大陸，既能緩和其內部的危機，復可在國際間保持其大國強國的虛表，此所以縱在中共內部奪權鬥爭激烈，其政權動盪不安之際，仍有若干國家，陸續與中華民國斷交，而與中共建立外交關係。

五、加強民間關係，進行對於美國內部的滲透。中共明知在當前錯綜複雜的國際關係中，與美國建立國家之間的關係，不是一蹴可幾，但是文化的交流，人民的互訪，貿易的發展，則是對美和解的自然結果。如此中共的勢力，便可深入美國的民間，進行挑撥離間，滲透顛覆，活用「以農村包圍都市」的戰略，利用美國人民，影響美國政府，支持中共的政策，甚至等待時機成熟，展開美國的革命。一九七一年八月十四日中共印發之內部政治教育文件，即曾明白表示：「爲了發展同美國人民間的友好往來，爭取

¹⁸ 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大多認爲此三項乃是中共改善對美關係的主要動機。參看註①，頁三十一—三十三，及史丹佛大學教授H. Hartung, Jr.等在眾議院外交委員聽證「美國與中共關係——關係正常化的進程」中的證詞。

機會，創造條件，把工作做到美國人民中間去，從思想上、輿論上幫助美國人民起來革命，推翻美國的反動統治。」^①中共改善對美關係的陰謀所在，於焉可見。

關係正常化的障礙(一)——所謂「臺灣問題」

凡此可知，中共與美國間關係的改善，事實上並無廣大的共同基礎，尼克森總統一九七一年二月廿五日發表的「世局咨文」中，就明白表示，美國與中共之間，具有思想意識的衝突，利害關係的不同，與世界觀的歧異。中共是始終堅持要「打倒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要在亞太各地排斥美國的勢力，要煽動美國人民革命，推翻美國政府，他們主要的「平行利益」，不過是抑制蘇俄，防止蘇俄對中共的軍事行動，圍堵蘇俄勢力的膨脹，而穩定以美國—中共—蘇俄三角關係為重心的國際均勢，所以中共與美國關係的改善，必然是局部的短期的，雙方均有「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隨」的心理。因此所謂「上海公報」發表迄今，業已五週年，雙方儘管不斷表示要進行關係的正常化，但正常化的完成，顯然是遙遙無期，此中因素衆多，所謂「臺灣問題」當然是一個基本的難題。

一九七一年間，季辛吉首次訪問大陸時，周恩來即要求美國確認臺灣為中國的一部份，季辛吉和周恩來，終於達成原則性的協議：「臺灣是中國的一部，臺灣政治的未來，應由中國人以和平的方法，自求解決」^②。以後的「上海公報」，也就大體上包涵這個原則性的協議。季辛吉這種態度，代表美國對於臺灣地位問題的立場的改變。韓戰以前，美國原已確認臺灣為中國的領土，韓戰爆發以後，杜魯門總統却以臺灣地位未定，認為：「臺灣未來地位的確定，須待太平洋完全恢復與對日和議完成之後，或由聯合國負責研商」^③。就在一九七一年季辛吉密訪北平之前，美國對臺灣地位的立場，仍是如此，當年四月廿八日，國務院發言人布瑞曾謂：臺灣的法律地位未定，臺灣地位的決定，有待國際的協商^④。故在長達十七年，舉行一百三十五次的華沙會談中，美國總是拒絕與中共討論所謂臺灣問題。實則臺灣為中華民國的一省，並無所謂法律地位的問題，中共堅持「臺灣問題」乃為美國與中共關係正常化的障礙，要求解決所謂臺灣問題，其真正的企圖，自謀藉此消滅中華民國，便利其對外的擴張與侵略，不言而喻。

現在國際間的中國問題專家，甚至美國若干官方人士，也認為中共與美國關係正常化的關鍵，實為「臺灣問題」的解決，「臺灣問題」如何解決呢？中共所堅持的原則，是美國應與中華民國斷絕外交的關係，廢棄中美之間共同防禦條約，撤退美國在臺灣

^① 臺北中央日報，一九七二年二月廿四日。

^② 同①，頁一三三。

^③ 一九五〇年六月廿七日杜魯門總統的政策聲明。

^④ 參閱作者：「世局與國運」，頁三十九—四十一。

及臺灣海峽的軍事力量；接受中共這三個原則，等於澈底犧牲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固必堅決反對，也完全違背美國自己在西太平洋的國家利益，豈是美國政府和人民所能容忍²²？蓋洛普民意測驗的結果，顯示百分之七十的美國人民，反對以犧牲中華民國作為對中共關係正常化的代價，第九十四屆國會中，簽署類似的議案的眾議員，也達二百八十人之多，足見中共所提對美建交的三原則，當非美國之所能接受，然而若干中國問題的專家學者，仍然認定臺灣問題的解決，乃是美國與中共關係的先決條件，不能等閒視之，年來各方提出所謂解決的方案，綜合觀之，主要的不外乎：

「日本方式」，即是依照日本在一九七二年與中共建交的方式，一方面與中共關係正常化，另一方面與中華民國斷交，任由中日和約「自然失效」，而尊重「臺灣為中國不可分割之一部份」的中共立場；但與臺灣保持商務的往來、文化的交流與人民的互訪等非政治關係，亦即不承認臺灣為具有主權屬性的政治實體。

「總領事館方式」，即美國與中共完成關係的正常化，接受中共的建交三原則，但在臺北設置美國總領事館，保持地方性的政治關係，以確保美國在臺灣地區現有的各種非政治性的關係與活動。

「聯絡辦事處方式」，即美國與中共建交，與中華民國斷交，但在華盛頓和臺北互設「聯絡辦事處」，維持一種準外交的關係（Quasi-Diplomatic Relations），中美共同防禦條約應否廢棄，可視實際的情況，和今後談判的發展而定。

「德國方式」，即美國與中共建交，但仍保持與中華民國的各種關係。或在萬不得已的情勢下，接受中共建交三原則的一種或兩種，就是依照正常的程序，在一年前通知共同防禦條約的失效，或更同時宣佈美軍自台灣和台灣地區完全撤離。

這四種基本的方式（每種方式都可有不同變化的類型），中華民國基於其本身法統與國策，自必堅決反對。中共所能接受的，則只有「日本方式」一種。根據密西根大學愛克斯汀（A. Eckstein）在眾院外交委員會的作證上表示，一九七五年間，中共負責當局會對現任國務卿范錫所率領的美國名流訪問團保證，中共歡迎美國以「日本方式」與中共建交²³。然而此種方式，顯與美國政府維護臺灣安全，確保臺灣人民自由的政策背道而馳，更是有違美國絕多數的民意，不符美國本身的國家利益，所以這個方式的實施，可能性真是微乎其微！雖然高立夫（R. N. Clough）教授認為，美國如須採用「日本方式」，以與中共關係正常化，美國便應要求中共公開聲明或秘密保證不對臺灣使用武力，美國並應通知中共其將採取的相關措施，諸如重申對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關懷，決心維持與臺灣經濟關係的現狀，由國會通過特種立法，繼續出售臺灣武器以及不變現有商務貿易等等的安排²⁴。事實上，美國如

²² 耶魯大學法學教授 M. Reisman 甚至主張美國新政府應向中共否定尼克森、季辛吉對於臺灣地位的承諾，見一九七六年八月廿八日紐約時報。

²³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 The Process of Normalizations, Hearings Before the Special Committee on Investigations of the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Ninety-Fourth Congress*, pp. 30-31.

²⁴ Clough, R. N., *Sino-American Relations: The Republic of China Dimension*, Paper Present at the Conference on Sino-American Relations,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Dec. 16-18, 1976, pp. 15.

果採取「日本方式」，完全接受中共建交的條件，就等於發給中共「解放臺灣」「消滅中華民國」的執照。

關係正常化的障礙(二)——所謂「制俄問題」

不獨此也，美國與中共當前主要的「平行利益」，只是制俄作用的發揮，但是「制俄因素」的運用，分寸取捨之間，極為不易，必須謹慎從事。截至現在為止，美國打開中共的「竹幕」，與中共建立「聯絡辦事處」，確已發揮相當的積極制俄作用，蘇俄與中共之間戰爭的防止，美俄之間「和解」的演進，限制戰略性核子武器與一般裁軍談判的發展，中東情勢的穩定，朝鮮半島局勢的緩和，不能不謂非美國改善對於中共的關係，善用「制俄因素」的積極效果^⑤；惟以蘇俄核子武器的力量，已可與美國等量齊觀，而其地跨歐亞兩洲，在亞太地區，自有其不容忽視的權益，其年來加緊勾結印度，支援中南半島的共產政權，全力推進所謂「亞洲集體安全制度」，並加強其在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海軍力量，皆在增強其對抗中共的勢力，而穩定美國、蘇俄與中共三角關係的陣容。易言之，如同美國，蘇俄也不願亞太地區的國際權力關係，立即有基本的改變，根據羅濱遜教授的分析，蘇俄對於所謂臺灣問題的紛爭，始終不願過問或介入^⑥，蓋其深知臺灣戰略地位的重要，及其權力關係上的複雜與特殊，臺灣的現狀如果改變，勢必影響亞太地區的整個權力關係，故美國如以改變臺灣的現狀而與中共關係正常化，或與中共發展進一步的親密關係，如以武器出售或贈助中共，或與中共結成某種形式的聯盟，則「制俄因素」就可能發生難以料想的反作用，可能逼使蘇俄採取激烈的反應，破壞三角關係的平衡。所以美國與中共關係的改善，必須十分謹慎而顧及分寸，過猶不及，這也是美國——中共關係正常化的另一個重要障礙。

同時亞太地區自由國家，特別是日本的立場與利益，亦與美國摒棄台灣，而與中共關係正常化的政策未盡符合。不論目前亞太自由國家外交或政治上的姿態如何，此等國家國策的重點，仍是安全的確保與民主制度的發展。過去二十七年中，美國協同自由的國家，有效圍堵中共的勢力，維持亞太地區權力的平衡，實是亞太自由國家安定與繁榮，自由與民主的基礎。美國總統之一再訪問大陸，美國軍事力量之自中南半島擺脫，已使自由的國家，尤其是泰國、菲律賓和馬來西亞，陷入軍事和政治的困境。日本遭受「尼克森震撼」所激起之對美國猶疑不安的精神狀態，至今尚未完全恢復，如果美國進一步改善與中共的關係，而犧牲中華民國的權益，則中共如虎添翼，其爭奪亞太地區的霸權，當為必然的邏輯。因此日本福田新政府，對於美國可能效法日本，對匪建交，極感不安，蓋因美國不同於日本，美國是自由世界的領袖，美國與中華民國具有共同防禦條約的關係，實不能也不應自毀國際的信用，

⑤ 參閱 Robinson, T. W., *China as A Factor in American-Soviet Relations, and the United States as A Factor in Sino-Soviet Relations*, Prepared for Conference on Sino-American Relations,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Dec. 16-18, 1976.

⑥ 同前註頁十。

自喪其維護自由的立場，步上日本的後塵，實行所謂「日本方式」對中共關係正常化。

何況臺灣戰略地位的重要，雖然未必如同已故國務卿杜勒斯，致送艾森豪總統的「新港備忘錄」(New Port Memorandum) 中所謂，臺灣有失，整個亞洲的赤化，便將無以避免²⁸，惟其攸關東北亞，特別是日本與韓國的安全，屏障東南亞的側翼，掌握太平、印度兩洋交通的樞紐，是美國西太平洋鏈島防線的主要環節，更是中國大陸和海外將近九億中國人民的明燈，其關鍵性重要性，豈有可疑？在美國宣布新太平洋主義，強調日本地位的重要，而蘇俄的海軍力量控制日本海，制霸西太平洋的緊要關頭，美國如果貿然與中共關係正常化，這不但是中華民國的悲劇，且也必是美國乃至整個自由世界的悲劇。

美國與中共關係的僵局仍難突破

卡特總統的新政府，雖與中共駐華盛頓「聯絡辦事處」主任黃鎮，一再接觸，並不斷強調，美國將在「上海公報」的基礎上，尋求與中共關係正常化的目標，但卡特總統自己，及其國務卿范錫，均曾反覆保證，必將顧全臺灣的安全，不至犧牲中華民國的利益，二月八日卡特總統接見黃鎮之後曾謂：「我們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是以上海公報為基礎，……：在過去數年中，在加強我們兩國關係上，已有重要的進步，我們希望在今後數年內，這種關係將更為增強」²⁹。可見卡特總統，並不以促進美國與中共正常化為其外交措施的優先，只是希望在今後數年內，增強彼此的關係而已。

誠以臺灣地區現況的維持，是確保亞太地區國際均勢的必要條件；臺灣現況之不合理的改變，勢必動搖國際的均勢，威脅東北亞和東南亞的安全，危害美國在西太平洋的國家利益，初不僅犧牲中華民國的權益已矣。此所以特萊格爾教授認為，美國若以「日本方式」對於中共建交，必將嚴重損害美國道義與政治的地位，大大喪失其在亞洲的可信性與可靠性³⁰，何況中共扮演笑臉，與美國和解，由反美而親美，純是毛澤東所謂「革命外交」的「靈活運用」，絕無與美國結盟為友的真情實意，更無與美國持久之共同利益的存在。中共這種革命外交的兩面手法，在對美國的運用玩弄上，中共對外聯絡部部長耿飈，去年八月廿四日在北平對「外交學院」畢業班的演講中，曾有不打自招的透露：

「從整個戰略觀點來說，我們放下中美之間的爭執，就可以使我們全力對付一面（指蘇俄），並更能得到時間，先解決我們內部的問題，……：所以努力搞好中美關係，減少一個敵人，團結更多的朋友，這是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線的具體表現，也是根據形勢

²⁸ Hoopes, T., *The Devil and John Foster Dulles*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 1973) pp. 446.

²⁹ 一月八日合衆國際社華盛頓電。

³⁰ Troger, F., *The Taiwan 'Problem'*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23, 1976.

需要而提出的。

「一些革命的盲動主義和冒險主義者，他們在對美關係上，沒有正確地看到美國統治階級的兩面性，大多是單看其反動的一面，強調鬥爭，根本沒有看見其軟弱的一面，可予利用，以致否定對美國的軟弱，進行必要鬥爭和利用的想法。不管從那一個角度來說，對美國的政策問題，我們必須要有一個正確的觀念，即第一，美國仍然是帝國主義的國家，第二，根據形勢發展，我們要在某一些方面，積極搞好中美關係，這兩方面包含著既團結又鬥爭的哲學，是實行一項既有的原則性政策，而又有靈活性策略的問題。……只要我們充份認識到美帝的兩重性，就很容易理解今天我們所實行的對美政策，看似矛盾其實不矛盾的情形」^⑳。

這一篇歌頌的演講，就是中共所謂「革命外交」理論，在對美國實施上的具體說明。中共之改變對美的敵性態度，是其對抗蘇俄策略的一時權宜之計，並無基本立場的轉變，只是拉一打一，聯絡次要的敵人，打擊主要敵人之國際統戰策略的暫時運用，美國仍是帝國主義者，仍是中共擴張其勢力的障礙，也仍是中共所終要打倒的對象，美國對此不能視若無睹，迷惑於一時制俄利益的一致，而不顧其基本的國家利益，斤斤計較於所謂「上海公報」，或一九七二年尼克森、季辛吉對毛澤東的祕密承諾：「將於數年內斷絕對於中華民國的邦交」^㉑，追求美國與中共關係的正常化。

卡特總統的新政府，重人權、講道義，對於毫無法律拘束力的「上海公報」，必不至為其所限，何況公報的內容，並無規定應與中共建立外交的關係，尼克森的祕密承諾，若係事實，則是美國立國兩百年來的奇恥大辱，卡特總統更無遵守的義務。臺灣海峽現狀的凍結，已達二十七年，美國與中共關係的僵局絕無以「日本方式」，予以打破的任何理由，否則二十七年前甘迺迪總統沉痛的隱憂，便將成爲事實，不獨亞洲終將赤化，美國也難逃最後的劫運。

中華民國與關係正常化問題

儘管中共與美國關係的正常化，障礙重重，但是中共和美國的新政權，似乎均在採取必要的步驟，促進所謂關係正常化的發展。華國鋒的新政權，表現尤爲積極，諸如：(一)起用「知美」人士黃華爲外交部長，^㉒留任黃鎮「聯絡辦事處」主任的地位，顯在便利對美談判的進行。(二)逼使蘇俄邊界談判代表返國，以示中共與蘇俄之間，妥協無從，衝突仍必繼續，爭取美國的同情。(三)主動建議大通銀行總裁大衛·洛克費勒，雙方即可開始商談凍結資產問題，解定加強商務貿易的困難。(四)邀請國務卿范錫在本年內訪問大

⑳ 每週匪情通訊，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廿六日。

㉑ 專欄作家 J. Kraft 之報導。

㉒ 黃華曾在美國教會所辦的燕京大學就學，且在美國久留，對美國政府與人民的心理與行爲，當有較清楚的認識。

陸。(四)增加對加拿大、阿根廷及澳洲購麥的數量，顯示大陸糧食的市場，具有極大的潛力，誘惑美國的商人。(五)策劃在美的同路人，利用「上海公報」發表五週年的機會，舉行集會遊行及向卡特總統致送公開函，要求早日關係正常化，製造「民意」，加強對卡特政府的壓力。(六)卡特總統的政府，也已：(一)一再表示關係正常化，是其對中共政策的目標，「上海公報」是其所將遵循的原則；但在正常化的同時，不能不顧及台灣人民的自由與安全。(二)強調蘇俄的人權問題，對蘇俄採取強硬的姿態。(三)范錫國務卿正式宣佈，彼將於年底訪問北平，貿易問題將是討論的主題。(四)卡特總統和國務卿范錫，曾經分別邀晤黃鎮，但對中華民國的外交代表，却保持相當的距離，蓋因美國仍期從改善與中共的關係中，逐步達成其國家政略與戰略的企圖，諸如：(一)牽制蘇俄，平衡所謂三角關係的平衡，(二)穩定亞太地區的國際秩序，(三)促進限制核子武器擴散的普遍化，(四)爭取中國大陸廣大市場，(五)促成所謂台灣問題和平解決，消除東北亞危機的重要因素。

美國和中共關係的調整，目前雖有如此的發展，然如范錫國務卿所指出者，所謂關係正常化的「模式」和「日程」，仍須進一步的研究，此「模式」與「日程」者，過去是現在也依然是所謂關係正常化僵局的關鍵。

在中共與美國關係的演變中，中華民國不僅是一個主要的關係國，對於所謂關係正常化今後的發展，更是一個重要的決定因素，因為：

第一，中美兩國是第二次大戰時期併肩作戰的盟友，韓戰爆發之後，又是具有共同防禦條約關係的盟邦，歷史的關係悠久，人民的交往頻繁，友誼敦厚，而經濟上的合作，尤為密切，去年中美雙邊貿易的總額，將近五十億美元，所以中華民國乃是美國在亞洲最富歷史性的與國，在國際政治的運用，始終是美國的支持者，冷戰期間，尤其是美國在亞太地區圍堵共產勢力的支柱，美國在太平洋鏈島防線的主要環節。美國現在如與中共建交，摒棄中華民國，在美國的立國精神，國際道義與現實的利益上，均是不可補償的重大損失。

第二，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係在中華民國政府退出大陸，暫遷台北之後所簽訂，簽約以來的二十餘年，對於西太平洋國際秩序的穩定，與平均勢的確保，皆有明顯的貢獻。中華民國對於條約的義務，始終忠實而澈底的履行，不但充實其軍事的力量，承擔共同防禦的任務，而且依據條約的規定，「加強其自由制度，……發展其經濟進步與社會福利」，並竭盡所能，保障人權，增進人民的一般福利，建立一個富裕康樂的社會。所以今日中華民國的國情與國勢，較之簽約當時，益見健康良好，中華民國無所求於美國，但至少也希望美國尊重條約的尊嚴，繼續履行條約的義務，保持國際的互信。

⑳ 根據社那多地球郵報的北平報導，中共最近向加拿大等三國定購的大麥，業已超過五億五千萬美元。見紐約時報三月三十一日。

㉑ 二月二十七日「上海公報」發表五週年前後，單是紐約一地，即有所謂「紐約華埠促進中美關係正常化協會」，「紐約市促進中美關係正常化聯盟」及「全美華人聯誼會」等新組成的團體，舉行集會遊行，刊登廣告，從事各種遊說的活動，要求卡特政府，即與中共關係正常化。

第三，這個條約萬一不幸而被片面廢棄，中華民國與美國的關係，由盟邦與國而轉為疏離冷漠，亞太地區的國際局勢，必將因之陷入動盪不安的緊張狀態，因為中共終必把握時機，運用種種陰謀策略，加緊其所謂「解放台灣」的鬥爭；中華民國為求鞏固其本身的存在與發展，必要之時，也不得不採取攻勢的防禦，打擊中共的侵略勢力；而亞太地區的自由國家，以中美關係為前車之鑑，對美國喪盡信心，必圖另求與國，期以自保，如此亞太特別是東北亞地區的新戰亂，豈能避免？

第四，美國有關當局，總是希望所謂台灣問題的和平解決，去年民主黨的競選政綱，即明白規定：「我們與中共的關係，應該繼續依循和平的路線，在台灣問題未來和平解決的範疇內，儘早促成包括建立外交關係的正常關係」。^⑤美國少數人士甚至認定，中共與美國關係正常化之後，中華民國勢非與中共談判不可，實則中共逼害人權，實行暴虐統治，中華民國曾經不斷堅決表示，絕不與之談判，誠以談判妥協，根本違反八億以上中國人民的意志，絕難獲致任何具體積極的結果，因此美國在其調整與中共關係的過程中，如果存有促成「國共談判」的幻想，則必鑄成大錯，害人害己。

第五，今日大陸鼎沸，四分五裂，華國鋒的政權，如在火山之上，「四人幫」的潛勢力，依然遍佈大陸各地，就是擁華的力量，也是派系分歧，各自西東，並不一致，各省的軍事頭目，更是擁兵自重，割據自雄，今日的華國鋒，何嘗不可能就是明日的鄧小平？且以大陸人民久受清算鬥爭之苦，食不飽，衣不暖，對中共政權恨之入骨，反共抗暴的鬥爭，在天安門事件以後，愈演愈烈，一般人民對中共的統治階層，咸抱「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的心理！在此情勢下，美國若與中共過份親近，豈不增長中共的威勢，重增大陸人民的痛苦，妨礙中國大陸自由與民主的恢復，何況當前權力鬥爭的塵埃尚未落定，政權尚未定於一尊，美國究將與何人關係正常化，亦是問題。

故就中華民國的觀點言，「聯絡辦事處」的成立，應該就是中共與美國關係調整的極限，也應該就是所謂關係正常化發展之告一段落，美國亦已因此而獲得其所預期的戰略利益，在三角關係中，獨佔優勢的權力地位；反之，美國如以「日本方式」與中共建交，甚至如若干人士所建議者，以武器出售中共，或與中共進行某種程度的軍事合作，^⑥結果豈僅犧牲中華民國而已，且也危害美國本身的權益，可能激起蘇俄激烈的反應，造成亞太自由國家的不安，現行國際的結構，就將無以確保，亞太地區乃至世界規模的戰亂，更是無以避免。

美國近代的執政當局，大多自認其為實用主義或現實主義者，中共控制中國大陸，不論其如何不穩定，但總是一個現實，美國因此調整其對中共的政策，似是理所當然的措施，然據現實主義者季辛吉，在其從政以前的研判，世界上共有兩種現實主義者，一

^⑤ 該政綱原文為：「Our Relations with China Should Continue to Develop on Peaceful Lines, including early movement toward normalizing Diplomatic Rel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a Peaceful Resolution of the Future of Taiwan.

^⑥ 參議員賈克遜，前國防部長，現任卡特政府的能源主管斯列辛吉，以及蘭德研究公司研究員畢立伯里（M. Pillsbury）等，皆有類似的意見。

種是爲現實所限，遷就現實，另一種是基於自己的理想，創造現實，^④我們深望向具崇高理想與宗教信心的卡特總統，莫爲今日中國的現實所限，順應中共的要求，而應支援中國反共產爭自由鬥爭的繼續，至少也不應妨礙中國八億人民恢復民主自由的努力，協助中國人民創造一個理想的新現實。

④ Kinsinger, H., *The Troubled Partnership*, (N. Y. McGraw Hill, 1965) pp. 251.

中共與蘇聯關係之展望

笠原正明

一 前言

自去年九月毛澤東死後，中共內部的權力鬥爭日益尖銳化，從而引發了所謂「十月政變」。雖然華國鋒藉整肅江青等「四人幫」，求得一時的安穩，但是在歷史上離合集散反覆無常的黨內各派並沒有經這一事件而固定下來，並停止其相互對立。事實上，黨內各派毫無掩飾的爭權奪利之鬥爭，更趨熾烈化，華國鋒的地位亦日見困難。

其次，值得注目的是羣衆運動的抬頭情勢。自一九四九年以來，在表面上雖然反覆出現「一緊一鬆」的現象，但是中共經濟政策的基本原則，不可否認的是在於藉剝奪羣衆利益（壓制提高生活水準）來從事社會建設。長期被剝奪基本人權的大陸民衆，以毛澤東之死爲契機，爲爭取自由和「像人樣的生活」而起來，乃爲理所當然的事。這些舉動雖然尚未成爲有組織的羣衆運動，但是各種零星事件已逐漸爲華國鋒政權帶來「無聲的」巨大壓力。

在這種情勢下，華國鋒政權乃不得不重唱「三要三不要」，專心於謀求國內和黨內的安定和團結。例如他在去年十二月下旬舉行的「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所作的講話，則把百分之九十九的內容重點放在國內問題上面。他在講話中所提出的一九七七年的主要任務是：第一、繼續批判四人幫；第二、加強黨的建設；第三、開展羣衆運動，努力發展國民經濟；第四、加強馬列主義著作學習運動等四項，而其中沒有一項是有關對外政策的。這一事實表示了華國鋒政權的脆弱性，同時也可以據此預測至少在本年內（一九七七年）其對外政策不致於有較大變化。因此，從中共內部情勢判斷，在「中蘇」關係方面亦難於想像將在短期內會發生巨大變化。

可是，如果把角度轉移到全球性政治結構的變化之觀點來看，也許能成立與上述稍為不同的預測。以去年為界，國際社會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區分而言，經冷戰時代、多極化時代、低邊時代，而進入第四個時代。「低邊」結構崩潰的背景，必須考慮到蘇聯的軍備擴充和很露骨的對外政策等重要因素，其結果產生的新時代名稱，雖尚難確定，但它帶有「緊張」的特點，却是不容置疑的。蘇聯的軍備擴張，係以能在東西雙方從事正面作戰為目標。今後，勢必更加積極地從事兵力和裝備的擴充，其對外政策亦將更趨攻擊性。根據政治力學觀察，隨着蘇聯的積極行動，勢必引發更強烈的反作用。例如美國正準備增加國防預算。同時，世界每一個遭受蘇聯壓力的地方，亦必然採取各種各樣的應付行動。這些情況匯合起來，預料會引發整個國際政局的全般大變動。

以華國鋒為首的中共政權，儘管其國內和黨內問題非常緊急，但也無法處在這種國際局勢變動的圈子之外，並且不能不採取一些應對行動。在這種情況下，根據國際情勢的變化程度，在其應對行動方面當然也會出現相當大幅度的變化。譬如說，在某一個地區（或國家）的反蘇活動中加重了反共的性質，進而帶有反中共色彩時，「中」蘇之間可能出現某些合作關係。這種可能性是應該可以預料的。以過去的事實為例：一九六〇年的寮國危機中所出現的「中」蘇之合作；在越南戰爭中，「中」蘇雙方對北越的聯合援助等，均屬其範疇。今後，能充分預測到，在世界各地可能出現反蘇和反共意識的高昂情勢，隨之反蘇和反共的具體活動亦勢必更趨激烈。這種趨勢愈發展，「中」蘇之間的某些部分的合作關係之出現，也愈有可能。不過，筆者認為這些部分的合作或團結，不致於發展到「中」蘇關係全面性改善之地步。

簡而言之，今後的「中」蘇關係，基於時間和空間的變化，可能出現暫時的緩和局面，但是難於想像其雙方關係會達到全面性和解的程度。雙方的基本的敵對關係，今後不能不認為會半永久性地持續存在。在這裏，筆者已經先提出了結論，下面就筆者下此論斷的若干理由提出說明。

二 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破產

上述華國鋒在「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一定要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原則，貫徹執行毛主席制定的革命外交路線和政策，加強同國際無產階級、全世界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的團結，加強同第三世界各國的團結，聯合一切受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侵略、顛覆、干涉、控制和欺負的國家，反對蘇美兩個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

這些論調，是去秋以來由李先念及其他中共幹部，每有機會一再所說的，而並不是新鮮的東西。更早一點，在一九七五年一月所修正的中共「憲法」序文中亦明文規定了相同內容。由此可見，在形式上，這就是中共對外政策的基本方針。

可是，我們必須加以注意的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實際含義所在。我們一般所了解的所謂「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是馬克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說的，階級的消滅將直接導致民族差別的消滅的一些概念。他認為國家或民族是次要的存在，而超越於國家和民族的國際無產階級的團結與聯合，才是最為優先的。然而，中共在目前所提倡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不過是為使其追求邪惡目的之行動正當化的偽裝手段，而事實上他們所企求的目標是要使中共統治世界。毛澤東的「論十大關係」，足以證明這一看法。

「論十大關係」是毛澤東於一九五六年四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所作的講話，中共把它刊載於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上，一般認為中共在此時此地發表該文，旨在把它當作走向「四個現代化」的指針，而筆者所注意的是該文序言中的下述一段，即：「在國際上，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都要團結，不中立的可以爭取為中立，反動的要可以分化和利用。總之，我們要調動一切直接的和間接的力量，為我們建設成爲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

如果把毛澤東的上述說法 and 「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原來意思相對照，不難發現如下事實。就馬克思而言，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是「目的」，而各國內部的階級鬥爭以及革命是為實現這「目的」的「手段」而已。可是，毛澤東所指出的「目的」是中共的強大化，而其他的一切則被當作是為實現其目的之「手段」。所謂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亦被認為是為中共的發展服務的「手段」而已。這種「目的」與「手段」的調換手法，並不是毛澤東個人的發明，而可以說是中共成立以來所具有的特質。中共中心主義和中共至上主義傾向，早在北平政權成立前就可發現其原型。例如在一九二四年的「國共合作」之後，在各種形式的統一戰線構想的實踐過程中，可以舉出許多例證。當前中共對外政策的基本方針，可以說是這種思維方式在國際範圍的擴大適用。總之，從中共把自己的強大化當作「目的」之事實觀之，足證中共並不是其自稱的「民族解放者」或「和平的使者」，而僅僅是隱藏了征霸世界野心的帝國主義者。

自不待言，蘇聯亦具有濃厚的帝國主義傾向之國家，其程度與中共相比較，實屬有過之而無不及。與其說「具有濃厚的帝國主義傾向」，不如直截了當地說它是帝國主義國家。自史達林提倡「一國社會主義」論以來，蘇聯把共產國際當作謀求自己本國的生存和發展的工具而加以利用。蘇聯自我標榜為社會主義的「祖國」，並強求世界各國的民族解放運動和社會主義革命運動為蘇聯利益服務，而且事實上在歐洲和亞洲為其本身追求擴張，從鄰近各國奪取了廣大領土和權益，把東歐各國當作附庸國家，在政治、經濟、軍事各領域加以嚴密控制等等，乃是不爭之事實。史達林死後，其領導人雖經馬林可夫、黑魯曉夫，乃至目前的布里茲涅夫，有了若干次轉變，但是其一貫的帝國主義侵略路線卻沒有絲毫改變。雖然有時候提倡「三和兩全」，有時又高唱「低盪」，而把自己偽裝為和平使者，但是事實上仍為達到統治世界的最終目標而不斷地施展其惡毒行動。就「社會帝國主義」的範本而言，蘇聯確實是中共之「值得學習的先進」。

根據上述經過情形，可以說自一九五〇年代末期以來所出現的「中」蘇之間「不共戴天」的仇敵關係，乃為歷史的必然結果。列寧曾經指出：「帝國主義必然導致吞併和民族壓迫，因此必然導致抵抗的劇化」（列寧「帝國主義論」）。他的這種預言恰在共和蘇聯兩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成長與發展過程中出現。如今「中」蘇兩國已陷入了由所謂「帝國主義國家的相互矛盾」所造成的難於兩立的情況中。同時，如果雙方不把「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當作實現自己野心的「手段」予以放棄，則「中」蘇在理論上、實踐上的鬥爭，在今後亦將無法停止。

三 「中」蘇雙方的世界戰略

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破產，意味着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破產。即使如此，中共和蘇聯仍繼續堅持已經形骸化的理論，各自推進其世界戰略。因此，在意識形態以外的其他層次中，亦存在許多對立的火種。茲就雙方在世界戰略方面的矛盾和鬥爭加以考察。

自從「中」蘇對立以來，雙方在各種領域存有歧見，其中之一是對國際環境的分析各有不同，因而對各方的世界戰略之展開造成了巨大影響。雖然資料稍為陳舊一點，茲列舉「中」蘇雙方所發表的有關對時代特點的規定，加以比較研究。

「蘇聯認為現時代是『帝國主義陣營的不統一、向社會主義轉變，以及社會主義世界體系的形成與發展』的時代。對於現時代主要特徵的這種認識，乃是就現階段的戰略和策略、和平轉變、和平共存、戰爭與和平，以及裁軍等問題，引出結論的基礎」（一九六〇年六月二十一日蘇聯共產黨致各國共黨函）。

「中國共產黨不認為自己對現階段的力量對比之評價是錯誤的。我們要重新確認最近的力量對比的變化，正是為擴大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民族鬥爭和爭取和平的鬥爭之勝利，提供了絕好的機會」（一九六〇年九月十日中國共產黨致蘇聯共產黨函）。

上述函件均為「中」蘇對立初期所發表的。雙方所提出的有關對國際環境的基本認識，至今未有變化。十多年來，他們基於這種認識，各自展開了其世界戰略。關於環境認識上的「中」蘇雙方的差異在於：中共較為樂觀，而蘇聯「保持」警惕。蘇聯認為客觀情勢在不穩定的情況下，如果採用強硬政策可能會挑起全面性核子戰爭，因而改用富於彈性的戰略戰術，藉此鞏固自己的立場，並逐步蠶食資本主義各國。另一方面中共則認為當前國際環境已向社會主義陣營絕對優勢的方向轉變。所以它認為蘇聯的戰略，落後於情勢的發展，並且主張繼續維持緊張狀態，連二接三地、全面的推動社會主義革命和民族鬥爭，以利於走上世界革命的道路。

當然，在「中」蘇雙方的上述判斷和主張後面，存在着強烈的「國家利益」因素。蘇聯認為如果遷就中共論調，美蘇全面戰爭的危險性勢必增加，同時緊張情勢的持續，也會削弱蘇聯對共產集團各國之控制力量。另一方面，中共則懷疑蘇聯所提倡的和平共存勢必造成美蘇分割世界，並認為動亂有助於加強其國際地位，所以採用了更加偏激的政策。「中」蘇雙方對於環境認識和「國家

利益」之不同，擴大了兩者之間的鴻溝，同時也因而造成了其雙方的對立。由於雙方基於其各自的不同判斷，推展了不同戰略，所以在展開戰略過程中產生了競爭和衝突。如果利用極端簡單化的表現方式來說，「低盪」和「天下大亂」是「中」蘇戰略的不同特點，因為其戰略的適用對象相同，所以招致了今天的激烈對立局面。茲就其具體情況，作若干觀察如下：

蘇聯在冷戰結構崩潰之後，把最大力量用在調整對美關係上面。以一九六二年的古巴飛彈基地事件為契機，他們致力於企求出現足以抑止美蘇全面戰爭爆發的最低限度之體制。一九六三年的禁止部分核武器試驗條約、一九六七年的防止核子擴散條約、一九七二年的第一次限制戰略武器協定等，均係為維持上述體制而作的妥協。然而，蘇聯的對美接近，絕不是發自於謀求持久和平的熱望，而係基於藉避免武裝衝突爭取時間，等待美國的力量衰弱以後再採取決定性行動之算盤。為此，蘇聯為着建立軍事優勢，不惜犧牲人民生活的提高；同時，不斷分化以美國為首的民主集團的團結，並致力於拉攏第三世界。顯而易見，前者（指避免武裝衝突）所採用的政策是「低盪方式」，而適用於後者的方針則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蘇聯在歐洲為着拉攏北大西洋公約國家，提出互不侵犯口號，並倡議成立歐洲集體安全體制；在亞洲，則為着排除美國而提議成立亞洲集體安全體系。一九七五年八月在赫爾辛基舉行的歐洲安全合作會議所簽署的宣言，對蘇聯外交而言，不能不說為一項成就。可是，外交上的兩面性，是蘇聯的歷史性特徵。他們為在落後地區擴大其影響力而採取的政策措施是毫不保留的，其顯明的實例就是對北越的援助和介入安哥拉內戰。在這些地區，它高舉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旗幟，進行很露骨的軍事援助，或者利用武裝介入，扼殺自由主義，以擴大其勢力範圍。

目前，以強大軍事力量為後盾的蘇聯之威信，已不可輕視。可是，地球上的大部分國家均厭惡蘇聯，並企求擺脫蘇聯的控制，也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東歐共產國家和西歐各國共黨企圖擺脫蘇聯的傾向，就是明證。蘇聯雖然十分清楚這種趨勢，但是要制止已開動的車輪，以扭轉其方向，却是不可能的事。在目前乃至最近將來，蘇聯所要推動的世界戰略，仍然是運用「低盪」與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兩面外交。事實上，也沒有比這些更有效的政策了。

與蘇聯戰略對照起來，中共的意圖正如林彪在「人民戰爭勝利萬歲」一文中所說的，要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在落後地區繼續掀起民族鬥爭和人民革命的風暴，以便在世界的混亂中提高自己的地位。期待與現實之間會存在某些差距是難免的，可是像文革時期的「造反外交」却是沒有考慮其後果而採取的「捷徑式實踐」之典型。中共嗾使亞洲各國，尤其是東南亞各國的共產黨從事武裝鬥爭，企圖一舉成立親中共的社會主義政權。但是，過於性急的「革命輸出」却遭到慘敗，而所得到的却是亞洲各國對中共的不信任感，同時中共還遭受來自蘇聯的軍事重壓。被孤立的不安和蘇聯的威脅，造成了中共決意暫時改變其對外政策的動機。進入一九七〇年代後中共為脫離其困境，開始向西方各國接近。這不過是策略的轉變而並不是戰略層次的轉變。從中共所提出的「反對霸權主義」口號，可以窺知一旦情況好轉後將會立刻回復其本來路線之意圖。一九七三年秋，當石油危機帶來的國際政治和經濟之混亂出現時，中共認為它所盼望的時機已經到來。從一九七四年四月鄧小平在聯合國大會所發表的演講中所說「他們（美蘇兩國）的互相

爭奪必然引發動亂。只要帝國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存在，世界上決無安定和持久和平」一節，明確地顯露了中共的意圖。於是，中共開始一方面利用反對霸權主義和殖民主義，進行相互經濟合作的口號，團結第三世界集團，另一方面引誘除美蘇兩國之外的先進工業各國，試圖建立以中共為首的一大勢力集團。但是，各國並沒有天真到如此簡單地為中共陰謀所乘，況且由於中共內部「文革派」與「實務派」的暗鬥日趨激化，致使上述構想迄今無法落實。在最近的將來，中共究竟將展開何種對外政策，雖尚不得而知，但是根據下述理由，仍將繼續沿用上述戰略的公算較大。

以上，簡單地回顧了中蘇雙方的世界戰略之展開過程。如果把雙方的特點作一比較，則可指出如下各項。蘇聯戰略，係採兩面方式，即對於美國和Second World World 採用「低盪」政策，而對其他地區各國則以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為名採取各種介入手段。蘇聯所以採取這種兩面外交的幕後因素係基於蘇聯的估計，認為如果與前者發生磨擦，可能把其本身推向戰爭邊緣，而對於後者則採取稍為強硬手段亦不致於引發戰爭。因此，蘇聯就反覆使用這種兩面政策，以等待整個形勢之好轉。與之相反，中共的世界戰略，一方面拉攏美國對抗蘇聯，以彌補其力量之不足；另一方面，則提倡國際統一戰線，盡可能地爭取更多的國家在自己周圍，並等待機會「輸出革命」，企圖在這些國家建立傀儡政權。不過，在「輸出革命」時，它不採取蘇聯方式——直接介入——，而偽裝當地人民的「自發性起義」之形態，乃其一特色。

「中」蘇世界戰略的異同已如上述，但是其差距是形式上的，在本質上並無不同。因為僅僅是由於雙方所處的內外條件不同，形成了它們之間的不同戰略形式，而其最終目標是統治世界。所以，「中」蘇兩國在展開戰略過程中，競爭和對立是不可避免的。

四 最近的「中」蘇關係

去年二月，布里茲涅夫在蘇共第二十五次代表大會上提及中共問題，並對於改善「中」蘇關係問題作試探。當然，係針對不久將來即將出現的中共首腦部門的更替預作鋪路。至九月，毛澤東死後蘇聯對中共的和平攻勢，加緊進行，這是蘇聯判斷在毛死後的中共政權有接近蘇聯的可能性之後所採取的行動。蘇聯輿論機關不但停止了對中共的批判，而且提議重開邊境談判，以便把握改善雙方關係的機會。這種方式，在一九六九年柯錫金訪平後所開始的「中」蘇和解工作中，亦曾採用過。

可是，一九六九年的情況同目前的情況比較，不難發現若干極為引人注目的不同現象。在一九六九年的談判中，中共主張最力的是邊界問題本身。中共於同年十月八日發表的「關於中蘇邊界問題的文件」，從帝俄的侵略亞洲說起，繼之反駁蘇聯有關邊境問題之主張，並責難蘇聯的擴張主義。其背景中不能不注意的是：同年三月所爆發的珍寶島事件；在此前後所出現的累次的雙方邊境衝突事件；以及當時的中共正處在文革後內外環境極端惡劣的情況等等條件。然而，在當前，「中」蘇關係雖仍處於對立狀態，但

是却不存在軍事侵略的迫切威脅，而是由於中共與美國搭上了關係而加強了牽制蘇聯的力量。加上，全球性的反蘇情緒之高漲，又間接地發揮了掩護中共的作用。因此，目前中共在其內部雖有許多弱點存在，但是其對蘇態度較一九六九年當時更為強硬，乃為理所當然的。

去秋以來，儘管蘇聯利用各種手段試圖接近中共，中共却並無相對的反應。其理由之一，可能是基於上述諸因素。那麼，今後他們是否繼續採取同樣姿勢呢？茲將中共去年底至今年初的對蘇批判之一些論點，加以分類整理，以作觀察未來「中」蘇關係的資料。

第一、是批判蘇聯對第三世界的經濟擴張。根據中共的看法，蘇聯對第三世界的經濟擴張之動機與目的是「……國民經濟軍事化，使它的國民收入增長率和工業生產增長率不斷下降，農業生產情況更糟，市場供應緊張，資金短缺，外債劇增，突出存在着燃料、原料日益嚴重不足的問題。在這樣的情況下，蘇修越來越想通過『國際分工』，向發展中國家進行擴張和掠奪，來擺脫經濟困境，為其反革命的全球戰略服務」（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人民日報載茅文者所撰論文）。簡單地說，它斷定蘇聯所主張的所謂「國際區域分工論」，不過是通過不等價交易剝削開發中各國，並在強制它們接受永久性的單一經濟體系之前提下，把這些國家置於自己勢力範圍之野心而已。中共把蘇聯的這種做法稱為「新殖民地主義」，並抨擊為阻礙開發中國家自主獨立的行為。中共如此批判蘇聯的原因之一，是雙方以爭奪第三世界領導權為中心的暗鬥所造成的。因此，預料今後「中」蘇雙方在這一領域中的責難論戰，勢必持續存在。

第二、是渲染在歐洲的反蘇浪潮。首先，中共對蘇聯的東歐政策，作下列批判，即：指蘇聯對東歐各國利用華沙條約實行軍事控制，利用經濟互助組織實行經濟控制，以及實行以捷克事件為典型的內政干涉手段，並強制推行同蘇聯的「一體化」。中共認為經過長時期積蓄下來的東歐各國的對蘇不滿情緒，已發展到即將爆發的地步。其次，指蘇聯的意圖在於以東歐為跳板，向西歐擴大其勢力範圍，而它所提倡的歐洲安全合作會議之舉行，以及歐洲裁軍的呼籲等等，僅僅是為實現其野心的手段。同時，還指出蘇聯的軍備擴充已為西歐各國帶來很大的不安，使「西歐國家面對着蘇聯威脅的嚴峻現實，提高了警惕，加強了防務，西歐各國聯合反霸有了發展，反綏靖的力量正在興起。歐洲的形勢既不會按照蘇聯新沙皇的霸權主義願望發展，也不會按照西方某些綏靖主義者的如意算盤轉」（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三日「人民日報」載新華社記者述評）。對於中共的這些說法，雖不能否定其真實性，但是它過份宣傳歐洲的反蘇浪潮，乃有其企圖所在。他們認為離間蘇聯和歐洲各國的關係，並促使其對立，對自己是有利的。

上述兩項論調，旨在發展地區性反蘇運動，至於在個別問題上所作的反蘇言論，更是不勝枚舉。例如裁軍問題、海軍的擴張活動、漁業問題、海洋法問題等等，由於篇幅所限，祇好割愛。最後，介紹中共批判蘇聯世界戰略的一些論調。十二月二十一日「人民日報」所載新華社記者述評，對蘇聯的「低盪」政策，作了猛烈的攻擊。其中，指出「蘇聯的『緩和』的確是一個危險的騙局，

是掩蓋激烈爭霸和擴張的烟幕」，並認爲一九七六年是其策略陰謀暴露和破產的一年。該文列舉了許多事實，藉以證明蘇聯的野心在於以軍事力量爲背景爭取世界霸權，並強調與蘇聯妥協的危險性。

以上所述是最近出現於中共報紙上的反蘇論調的概要。其論調中均充滿敵意，乃是顯而易見的。因此，從這一角度觀察，中共在短期內並沒有放棄其反蘇立場的跡象。

五 結語

今年元旦，中共的兩報一刊照例發表聯合社論，其中涉及對外政策者極爲有限。其論調與華國鋒在去年底所作的講話完全相同，就整個方向而言，似乎是要恢復一九七四年來的政策。例如一九七七年一月四日「人民日報」所載「第三世界反霸鬥爭勝利發展」一文中的論調，乃爲其明證。該文中的有關「第三世界人民通過親身經歷認識到：超級大國、特別是蘇聯社會帝國主義，是當前反帝反殖反霸、爭取民族解放和維護國家獨立的第三世界最危險的敵人，並與之逐步展開面對面鬥爭」一段內容，可以視爲中共藉此暴露了其本身的決心和態度。他們爲着在第三世界扶植勢力，必定認爲必須與蘇聯對抗，並有必要排除蘇聯。

儘管中共中央忙於處理國內和黨內諸問題，但仍不得不表達上述決心。其主要理由已如上述，此外尚有華國鋒個人的立場也是不應忘記的。因爲華國鋒名望低，功績少，他是靠文革獲得飛躍式的升官機會，經代理總理、總理，升至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的最高地位，致令內外人士深感意外。正因爲如此，他的立場非常微妙，且不穩定。他沒有強有力的擁護階層，僅在各派力量對立的均衡上維持其地位，因此爲着保住不多所顧慮。這種情況。當然在選擇政策上會反映出來。他利用毛澤東遺囑來主張自己的正統性，在這種情況下，除沿用毛澤東路線以外，是沒有選擇餘地的。如果越過毛澤東路線，便等於自殺。關於對外政策方面，華國鋒所發表的言論很少，把僅有的加以綜合起來，可把它用「繼承毛澤東的革命外交路線」一句話加以概括。衆所周知，毛澤東是徹頭徹尾的「討厭蘇聯」。毛澤東討厭蘇聯的理由中，雖能舉出曾經與黨內親蘇派鬥爭等許多歷史過程，但是暫且不說這些，就目前情況而言，中共與蘇聯對立的路線已經根深蒂固，乃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就華國鋒而言，不管其個人的對蘇感情如何，爲保全自己，就不能不堅持對蘇對抗姿勢。

目前中共雖然在繼續抨擊蘇聯，可是有時還暗示一些與蘇妥協的可能性。但，據筆者觀察，這些暗示不過是對美國的姿態而已。今年一月上台的美國卡特政府的外交方針，尤其對中共的方針尚未固定。因此，中共爲着要使美國作最大限度的讓步，似乎正在利用對蘇關係。可是，既如上述，「中」蘇間的矛盾已發展至決定性階段，如果中共貿然與蘇和解，似難免把中共政權帶往絕路。因此，今後也許會出現一些曲折，但是中共與蘇聯的競爭和對立勢必長期持續下去。

日中（共）外交關係變化的可能性

井上茂信

——兼論美中（共）利害關係的正反兩面因素

賦與本人的題目原爲「日中（共）外交關係變化的可能性」與「促進美中（共）利害與共的正反兩面因素」兩題。但本人認爲該兩題不便分開來談，蓋所謂「日中（共）外交關係變化的可能性」，對美中（共）關係正常化的問題，實具有密切的關係，日本方面究應採取何種基本政策。亦值得深切注意。

因此，本文針對前一問題，擬就下列三點提出看法：

- 一、日中（共）關係最近的變化，尤其日本對北平態度的改變。
 - 二、日本對北平態度變化的原因。
 - 三、日中（共）關係未來變化的可能性。
- 至於對後一題目，亦擬就以下四點分析之：
- 一、矛盾中的美中（共）利益。
 - 二、美中（共）關係正常化的動向與日本的國家利益。
 - 三、美國應否急於承認中共。
 - 四、「日本模式」與「德國模式」。

在前述兩個問題中，本文係以前者爲重點，故在篇幅上前者多於後者，謹先說明。

日中（共）外交關係變化的可能性

一 日本對北平態度的改變

（一）歷史性的「宮澤四原則」

第五屆中、日「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重要文件選輯

論文題目雖指定為變化可能性的分析，但本人認為日本與中共的關係，已在逐漸發生了變化，其最明顯者，厥為最近日中（共）和平友好條約交涉業已停頓。自一九七二年九月日中（共）建交以來，歷時已四年有餘，雙方建交後之第二步工作即為締結日中（共）和平友好條約的交涉，結果迄今仍陷於停頓狀態。原因何在？誠然日本因洛克希德事件國內政局陷於混亂，而中共內部的政治動盪亦為主要因素，但最重要者，厥為所謂「霸權條款」形成中（共）日的對立，使交涉撞上暗礁。

日本方面既以「宮澤四原則」對「霸權條款」表明了基本的立場，本人即認為此乃日本方面在對中共關係的看法上，已有歷史性的新轉變。所謂「宮澤四原則」，係宮澤外相於一九七五年九月利用出席聯合國大會的機會，在紐約與中共「外長」喬冠華會談時，就條約交涉的癥結問題——「霸權條款」，提出的日本條件，其內容①霸權條款並非針對特定的第三國；②並不表示日中（共）時採取共同行動；③不能僅限於亞太地區；④必須符合聯合國憲章精神。

「宮澤四原則」的提示，係日本方面首次對中共表明，日本拒絕因締結日中（共）和平友好條約而將其納入中共的對蘇戰略編組，同時此一條件的提示，亦顯示了日本方面對迄今為止的對中共一邊倒傾斜外交，現已有所改變。因此，就「日中（共）關係變化的可能性」而言，宮澤所提條件，實具歷史意義。

（二）輿論的變化

其次必須指出者為日本報界在日中（共）關係中論調的改變。就結論言，彼等在日中（共）關係正常化當時所表現的熱烈，對田中政府承認中共無條件的讚揚，現已呈現由「北京熱」轉變為冷卻化的徵兆。

首先以「朝日新聞」而言，該報在一九七五年二月七日以「對日中（共）和平友好條約交涉的期待」為題的社論中表示：「中國所希望的『霸權條款』，刺激蘇聯是事實。該條約既為規律兩國間的將來和平友好關係，則『霸權條款』是否為不可缺者，交涉當局似應慎重的考慮」。該社論雖僅對「霸權條款」簡單地表示懷疑，但繼於同年四月二十日以「日本外交與霸權條款」為題的社論中：「明記『霸權條款』就長期言，是否將使日本立場困難？問題在於中共以蘇聯為『霸權條款』對象。以第三國為對象的此類條款，日本不應疏忽其具有軍事同盟的性質」，明確的表明了對該條款的反對態度，該報社論且自該時起，一貫的保持其前述的立場。

吾人瞭解該報一向係採取北平一邊倒的主張，例如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九日以「日中（共）復交一年」為題發表社論稱「日中（共）復交並非終點，而是日中（共）新時代的起點」，又謂「切勿忘記復交的初衷」，又指出「政府在日中（共）復交之後，再度承認日美安保體制為亞洲最重要的基本構造的見解，同時開始以第四次防衛計劃作為主要的戰力增強支柱。政府此種不揚棄戰後冷戰構造的外交政策，不可能產生新的和平秩序」。該報於兩年前如此偏向中共，反對美國，兩年後的社論竟能對中共採取極為冷靜的立場，不能不指其為難能的「搖身一變」。

其次為「每日新聞」。該報一九七五年二月六日社論——「對中（共）蘇的要求應有自主的對策」中指出「日本在中（共）蘇的要求中，已面臨嚴重的考驗」，復又對日中（共）和約表明了如下的恐懼：「在日中（共）和平友好條約交涉中，不應不顧慮第三國而進行，日本在中（共）蘇之間如偏向一方，喪失平衡，則將被捲入中（共）蘇對立的漩渦，故應平行的建立日中（共）、日蘇的緊密關係」。又在同年四月七日「霸權問題處理不得有錯」社論中指出「如按中共要求列入反對第三國霸權，說明日本已偏向中共，必惹起蘇聯越來越強的對日攻擊」，換言之，已擺出反對「霸權條款」的態度。但該報嗣在以後的評論中，則不斷提出如何運用表現方式，如何在處理技術上，與中共妥協的要求，亦屬事實。例如：一九七五年五月十九日提出「日中（共）交涉別無辦法妥協乎」；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七日謂「在中（共）蘇的外交上，應冷靜的應付」；一九七七年一月二十日社論復表示「希望日中（共）條約交涉前進」。總之，該報一面表明對「霸權條款」之恐懼，同時在另一面如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七日社論，則又表示「日中（共）友好關係不應留下空白部份」。

較之「朝日」及「每日」二報對中共表現更為討好的「讀賣新聞」又如何？綜括其社論論調，似亦對「霸權條款」有所懷疑。例如一九七五年二月十五日社論——「我國對中（共）蘇交涉的立場」，提倡「期望與中（共）條約交涉的同時，亦能開展與蘇和平條約的交涉」的對中（共）蘇等距離外交主張。該報復於同年四月二十五日社論——「霸權條款與我們的立場」中，一面表示「中共所求之霸權條款，不外打算排除霸權，此亦為亞洲的基本要求」的諒解，但同時指出「霸權條款如僅表明亞洲一般性原則固可，但若含有要求具體行動之意時，則有問題」，又謂「反霸之意義固值尊重，但如簡單地列入條文，則值得懷疑」。總之，該報的立場為「北平的立場極為瞭解，但日本的立場應慎重」。該報之所以採取如此模稜的立場，實如其在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六日社論——「大步前進中的日中（共）友好關係」中所強調者，「為了對緩和亞洲緊張局勢有所貢獻，亦應早日實現和平友好條約的締結」。同時為鞏固兩國子孫孫的友好基礎，更應超越兩國的理念和體制」，換言之，因其為日中（共）和平友好條約的積極推進論者，故不得不如此表現而已。

二、日本對北平態度變化的原因

（一）進入反省期的對中（共）外交

日本對北平態度的改變原因為何？其最主要的背景實為一般輿論對中共的認識，已進入反省期，對日中（共）外交關係，已能基於日本國家利益觀點，逐漸改變其看法。

何以日本會進入反省期？首先必須舉出者，為日本在日中（共）國交正常化中，「扣錯了扣子」的做法。現在始瞭解未能就美、中（共）、蘇整體的關係中，明確地找出日本的國益所在，而依據此一觀點作為出發點。對此，相信外國人不易瞭解，蓋日中（

共)國交正常化實由於日本政府被捲入了以氣氛及感情爲本位的日本報章雜誌所形成的巨流所致，此亦爲日本外交特殊性。

換言之，日本人的思考方式是基於情緒的及歌曲民謠的，和中國人或西洋人用冷靜的觀察現實，以事實爲基礎，進而逐次建立理論的思考方式，迥然不同。田中首相決心承認中共，係出於受尼克森訪問北平的衝擊，致在其心理上產生一種惶恐現象，而非在中(共)蘇對立的現實情況下，如何基於日本自身的戰略思考而決定者；尤其當時的日本輿論界，基於對中國國民(不含中華民國)的奇妙的贖罪論，以及不願社會體制和思想的各異，爲確立亞洲的和平而高唱「日中(共)提攜論」，使承認北平的要求成爲輿論上的心理變態現象，更造成一種火上加油作用。

一般皆謂「日本人是一面走路一面想事」，其最典型者，當推以「決斷與實行」著稱的田中首相。故日本在外交決定上，容易表現突變，如同開車走急轉彎道路一樣，尤其缺乏自主性的日本，經常追隨某強國行事。如果說好，是日本能隨機應變，說壞實爲一無原則國家。尼克森訪中(共)，固係基於季辛吉的「敵人的敵人即友」的現實主義對蘇戰略爲出發點，但不論其當時情況如何，與田中首相承認中共的問題比較，雙方之構想自始即有不同。

其次必須指出者：日本外交政策決定權並不在於外交專家的外交官員，而係在以爭取國民好感列爲第一要義的當權的政治家。而且在外交官員中亦有甚多專事迎合當時具有權勢的政治家者，使自身成爲「外交技術者」。彼等認爲承認北平可維護亞洲和平及日本的國家利益，既係出於虛構及幻想，故以此爲背景而促成的日中(共)國交正常化，自然不可能長久，日本國民之所以進入省期，道理在此。

(二)國民對中(共)意識的變化

日本進入反省期的第二個因素爲對中國大陸幻想的毀滅。日中(共)國交正常化後，「產經新聞」曾即於一九七二年十月進行一次以一千人爲對象的調查，結果日本人在想法上顯示：「認爲中共具有強大力量」者佔百分之六十五；「認爲中共正在創造理想社會」者佔百分之三十一點五；「感覺親近」者佔百分之二十九，總之，多具好感。另在同年一月份進行的「喜歡的國家與討厭的國家」的調查顯示：中共則佔「喜歡的國家」中第五名，在瑞士、美國、法國、英國之後。

但一九七三年三月再度以一千人爲對象進行調查時，中共在「你喜歡的國家」項目中落在第六位，一九七六年十一月的調查復又落在第十位，由此顯示，最後一次調查對象中，四人即有一人認爲中共可憎。另就日中(共)建交不久，亦即一九七二年十月調查中的一項「爲亞洲和平與繁榮，可與中共合作」而言，認爲可能合作者佔百分之六十五點三，但一九七六年十二月調查時，認爲「可和好共存」者僅佔百分之三十一，而「日中(共)將在對立中共存」則佔百分之四十六。茲再檢討一九七五、七四、七三年的調查結果，認爲「可和好共存」者爲百分之三十七、三十七、三十六；「將在對立中共存」者爲百分之四十一、三十五、四十。北平政局如此混亂再混亂，致使日本親北平的氣氛，亦隨之而冷卻的現象，前述調查結果，已有明顯的顯示。

(三) 國家利益觀點的產生

日本在日中（共）關係上進入反省期的第三個因素，必須指出為日本已產生了國家利益的觀點。中共在交涉締結日中（共）和平友好條約中，強迫日本接受「霸權條款」，致使日本政府當局及輿論界始明確的認識中共當初的意圖。換言之，日本人始覺醒中共自開始即意圖將日本納入其對蘇戰略。北平的最後戰略目標為制霸世界，中共當前的主要敵人為蘇聯，此在中共新憲法前言及周恩來有關憲法的政治報告中，均有明確的說明。但就日本而言，在軍事方面，懼怕蘇聯，更甚於中共。

蘇聯對日中（共）和約的交涉，屢次表示極為嚴峻的對日警戒態度，尤對「霸權條款」更明確的表示，此乃日本對蘇真正態度的表現，故日本如過度與中共再接近，則日蘇關係勢將惡化，不僅北方領土問題，在二百哩時代，日本北方漁業問題，亦將陷於無力交涉的重大危險關頭。非僅如此，日本在中（共）蘇對立中將被捲入漩渦，在對中（共）蘇外交上，亦將陷於不能自主，軍事威脅更為嚴重。去年秋米格二十五機政治亡命事件，已使日本國民深感受自身的脆弱與可怕，因此，基於國家利益的需求，必須與中共保持一定距離，開始靜觀。

三、日中（共）關係將來變化的可能性

(一) 美中（共）日協商論的背景

觀察日本對中共外交變化的可能性時，首先必須注意者，為日本一部分專家為了對抗蘇聯的軍事威脅，提出了此時此地不如積極的加深日中（共）關係的論調。此一論調無疑的係產生於部分主張對蘇強硬論者之間，而彼等之所以如此主張，則又係利用美國前任國防部長斯勒辛格及藍特公司的毛根·皮魯斯貝里氏等倡導的「美中（共）軍事接近論」的看法。

美國關於美中（共）軍事接近論之重點，在於對中（共）提供防衛用軍事裝備，阻止中（共）蘇和解以及促使中（共）蘇在戰力上接近均衡，以減低蘇俄對西方國家之軍事威脅。

日本一部分人士所主張「美中（共）日協商論」的論點與過去日本在氣氛上強調「日中（共）接近論」，根本不同。彼等係根據其自己的國家利益觀點，認為日本應積極的參加美中（共）蘇戰備競賽，如此方能確保日本的安全並獲保障。上項主張的背景，係由於美國自發表尼克森主義以後，逐漸減少亞洲地區駐軍，而蘇聯海軍却在亞洲大為增強，對日本的軍事威脅增大所致。至於日本財界中一部分亦作如此主張者，則因彼等在潛意識中，始終認為中國大陸沿海海底油田遲早必將開發，且認為美中（共）合作開發可能性甚大，如建立「美中（共）日協商」關係，日本屆時即可插上一足。因此欲以「美中（共）、日中（共）」反對任何國家在亞洲太平洋地區建立霸權」之「共同聲明」原則為核心，進一步推展日美中（共）三國共同路線。

(二) 「美中（共）協商論」疑問點

首先必須指出者，美國內部對「美中（共）軍事接近」持反對論者仍佔多數，美國政府對因美中（共）過度接近導致美蘇關係惡化及和解外交陷於不可能，甚至破壞避免核子戰爭的可能性等，仍極重視，故在美中（共）接近活動中，至為慎重。況美國亦不致歡迎因「美日中（共）協商」而使美蘇關係惡化。在此必須指出美國在傳統上對日本技術及經濟與中共軍事及人口的結合，一向持有警戒論。例如民主黨眾議員雷斯塔·李·沃爾（紐約州選出）在眾議院國際關係委員會所屬「將來的外交政策研究發展小組」中以「新時代的亞洲在美國未來政策中所具之意義」為題，報告其歷訪亞洲國家的觀感稱（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八日報告）：「日中（共）提攜將使日本巨大工業力加以中共的資源和人口，而產生一超強國家。儘管今天仍為一種潛在性質，但其將來必為美國帶來真正威脅」。此外芝加哥大學韓思·門蓋索教授亦曾在其報告中表示：「如實現中（共）日霸權，必將出現超超級大國，屆時美蘇均將淪為二流大國」。（見一九七五年七月十五日美國眾議院所屬「將來的外交政策研究發展小組」舉行「重新評估美國外交政策」公聽會之發言）。又前述毛根·皮魯斯貝里氏在其「美中（共）準軍事提攜」專題報告中，亦明確指出「欲在加強美中（共）關係圍堵蘇聯的新形勢中拉攏日本參加，則事態必極為危險」，因此他也反對「美中（共）日協商論」之主張。

復就日本自身國家利益言，縱然美國決心進行美中（共）提攜，日本如追隨其後，必招致極大危險。蓋日本欲與中共締結和平友好條約，已對蘇聯形成刺激，北方領土問題及日蘇漁業問題，皆將因此而陷於不可能解決的困境，現若實現「美中（共）日協商論」，則日本等於明確地決定反蘇，日蘇關係之緊張必升高至不可收拾之地步。

(三) 日中（共）接近的限度

美國為一超級軍事大國，擁有利用中（共）蘇對立的實力，在保障其安全上亦可利用其核武器對蘇實施嚇阻，更因有太平洋與大西洋之屏障，對蘇聯之軍事威脅，在安全度上遠較日本為高，反之，日本在地理位置上與中（共）蘇接近，在中（共）蘇對立現況下，如因日中（共）接近而使現行對立升高，日本勢將捲入漩渦，屆時蘇聯必從正面對日施加軍事壓力，此種日美實力差距如能認真考慮，日本即不應與中（共）再接近，況日本國論更未臻於統一，又將如何參加大國力量競賽呢。

此外，日中（共）關係如較目前更為強化時，亦將招致東南亞國家對日中（共）之不安，可能迫使東協國家與蘇聯接近，在貿易與資源方面對日本具有決定重要性的東南亞情勢，將更陷於不安定的危險。

再就日中（共）接近在基本上日本人必須考慮者，日本與北平意識形態根本不同，況北平最終的目的為毀滅包括日本在內的一切資本主義國家，故在長期觀點上雙方利益的共通處甚少。如日本的經濟力量有助於北平加強其軍事力量，可能其矛盾不久即指向日本。綜合以上之分析，日中（共）關係之進一步發展，自然地必在某一程度上加以利車，換言之，所謂「暗中對立的共存關係」，可能將為日中（共）關係今後持續不變的關係。

四) 日本對美喪失信賴時

日中（共）關係並非絕對不可能發生突變，因此吾人亦不容過度樂觀。而發生突變的最大關鍵所在，為日本對日美安全保障條約信心發生動搖之時，蓋日本能維持民主主義體制，敢於在中（共）蘇爭取日本工作中，排除雙方魔手，堅持對中（共）蘇等距離政策，實因有日美安保條約之存在，使日本能受到美國防衛傘之保護所致。如日本國民對日美安保條約喪失信心時，日本政局針對安全保障問題，勢將陷於混亂，將出現最右的核武裝論和最左的非武裝中立論，分裂為兩個左右極端論調。在此情況下，共產勢力即使不致渡海直接威脅日本的安全，但日本國內之安定，必先崩潰而混亂，能否維持目前之民主主義體制和自由，殊值懷疑，日本國內情勢將陷於極為危險狀態。在此同時，可以預料中（共）蘇均將加強對日工作，就日本人傳統的反蘇感情設想，日本輿論在美國國防之情況下，為日本之安全保障，可能要求尋求與中共之合作。

日中（共）聯合所具之危險性已如前述，不僅將刺激中（共）蘇對立急速加劇，即對亞洲甚至整個國際情勢亦將帶來不安，同時一向對日中（共）聯合特具警惕的美國，更難坐視，日美關係亦將呈現危機。

(五)何為日本國家利益

現在必須討論者何為日本的國家利益問題。吾人瞭解對一個國家的安全保障具有決定性影響者為該國之地理條件，日本為一無資源的經濟大國，現在的繁榮靠加工貿易以享受其成。但日本位於美中（共）蘇三大勢力交接點的東北亞，而又與情勢頗具流動性的朝鮮半島、中國大陸以及中華民國為鄰。因此日本為求海外市場及輸入資源路線之安全，即必須使日本周圍地區有和平的國際環境。同時在國內言，因有「和平憲法」表示了「在信賴各國愛好和平國民的公正和信義中維持日本的安全和生存」的決心，而限制自國之武裝權。雖然該憲法有麻痺日本人對自身安全保障感覺的缺點，但另一方面因日本軍備支出抑制於最低限度，反而導致今日的經濟繁榮。

(六)宮澤發言所具之意義

日本人必須重新認識者，即日本周圍地區能有今日之安定，決非靠日本本身的努力，而是靠着日美安保條約、美韓及中美共同防衛條約等三個支柱的支撐。換言之，能維持美、中（共）、蘇利益衝突的東北亞現狀，始符合日本國益，而日本又是支撐東北亞地區保持現狀的上述三條約的最大受益國。

對上述三條約之關連性，日本人必須具有進一步認識，亦即必須瞭解對美防衛誓約的信賴具有共同的基礎，不問中美條約抑或美韓條約，如有一個喪失對美之信任，其他二約必跟蹤而崩潰，日本政府對卡特新政府有意撤退駐韓美軍的動向之所以表明強烈反對，即係因深恐由於對美韓條約信賴度的喪失，而動搖了日本的信任。另就中美條約而言，日本宮澤外相於去（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二日接見當時訪日之美國參議員曼斯菲德所言，實具歷史意義。該發言的要點：

1. 就日本立場而言，不希望美中（共）關係發生急遽的變化。

2. 對臺灣如採取日本模式，則對臺灣安全留下問題。

宮澤發言既表明日本希望亞洲維持現狀，同時更首次明確地指出支撐亞洲地區維持現狀的中美防衛條約，日本亦為受益國，此一發言實具歷史性的重大意義。換言之，宮澤發言之着眼，在告知美國：「如美國單方面為美中（共）關係正常化而廢除中美條約，則美國的同盟國對美國所締結之防衛條約的信賴度必為降低，對日本或韓國均將發生重大影響」。在此如再進一步探究，則宮澤發言可能已想到如美國廢除中美條約，則日美安保條約之信賴度亦必大為降低，繼之而來者為日中（共）再接近，而在此一情況發展中，日本政局必將陷於極度不安與混亂。

促進美中（共）利害與共的正反兩面因素

一、美中（共）利益的矛盾

促使美中（共）關係正常化背後共同利益，因雙方均以蘇聯為潛在性敵國，均有意在美中（共）蘇三角關係中，互相利用對方以抑制蘇聯的合縱連橫策略。尤其是雙方在太平洋地區為阻止蘇聯勢力之進出，利害一致。對此，美國於一九七五年十二月發表之福特聲明中，不僅強調為反對蘇聯霸權應加強美中（共）關係，更指出中共要求美國加強包括北大西洋公約的抗蘇軍事體制。另一方面美國亦可能有意利用美中（共）接近，以阻止流動不安的中共新領導集團，傾向中（共）蘇和解。

但關鍵所在為美中（共）結合並非戀愛之結果，所追求者為利害打算的同居，勉強之處過多。第一是美國為避免核子戰爭，始採取美蘇和解政策，較之與中共接近，更為國家的至高無上使命，因此極易妨礙美蘇和解的美中（共）接近，自有其界限。第二是美中（共）過度的接近，可能增添中共領導階層勇氣，進而對蘇聯採行挑釁性的軍事冒險。第三是美中（共）接近，將提高中共在亞洲的發言地位，使美國未來對亞洲的領導趨於困難。

總之，中共的着眼，在於擴大美蘇「兩霸權」間的矛盾，煽動其對立，以坐收漁利。反之，美國在美中（共）接近中將喪失其中（共）蘇對立上的第三者立場，目前享有舉足輕重的有利地位，可能因而消失，不利之處為大。

二、美中（共）關係正常化的動向與日本的國益

卡特政府雖已將美中（共）關係正常化，列為其外交目標之一，但是曾與日本政府約定將先行從事協商，故日本對此一問題除應確立日本之立場外，為表明日本的想法，尤應早日完成理論武裝。對此，首先必須告知美國，日本對美國以廢除中美防衛條約方式

承認中共，將堅決反對。其理由：第一是如同上述若單方面撕毀中美條約，則表示美國與其他盟國所締結之條約，今後皆可任意處理破壞，留下極為危險的前例，而影響所至，必導致美韓條約及日美安保條約可靠性之低落，進而動搖日美安全保障體制的基礎。第二個理由是由中華民國臺灣省對日本具有戰略的重要性。臺灣位於自由世界的西太平洋，日本至菲律賓的防衛線上，同時控制日本南方海洋運輸線，戴高樂總統曾適切的指出「對海洋國家日本而言，中國問題即為臺灣問題，該問題在十六世紀亦為英法兩國的棘手問題，拿破崙戰爭時的葡萄牙、直布羅陀及馬爾他的問題。此等地區在大陸國家等如插在咽喉的一根刺，在海洋國家為一支細的救命索，守衛此一地區為日本國益，欲奪取此一地區則為中共的國益」，因此，欲以臺灣換取美中（共）關係中常化的美國做法，日本為了國益必須反對。

三、美國應否急於承認北平

日本更必須強調：就美國國益言，急於承認北平的理由甚為薄弱。第一，北平的對蘇政策並非受美國的利益或想法所左右，而係因中共內部情況或打算所決定。換言之，中（共）蘇關係有其自身的進行路線，美國擬利用承認中共影響中共對蘇態度，可能性極微。第二是在對蘇關係上美國須利用中共，中共更需要美國，因此美國無必要在臺灣問題上讓步，同時如將承認中共的一張王牌賦予中共，北平可能以緩和反蘇立場來威脅美國一再對其讓步。第三是承認北平在現實問題上的價值甚少，日本及西歐國家承認北平後，並未獲得平等的外交待遇，不論在人事交流上或在外交官員人數上，北平對方絕不承認相互主義。第四，縱然承認北平，北平在解決國際問題上，絕不可能發生積極性作用。韓戰及越戰均係在美國未承認中共狀況下所解決，故關係正常化不致使北平的外交政策發生變化。第五，美中（共）關係正常化，中共必單方面解釋為美國承認北平，在法理上並無根據，且美國承認北平或廢除中美條約，均有違背上海公報及福特主義之精神。上海公報所謂「美中（共）關係正常化，相信對緩和亞洲及世界的緊張有所貢獻」及福特主義所謂「美國是太平洋地區國家，為緩和亞洲之緊張，負有積極參加的責任」。因此，美中（共）關係正常化是否有助於緩和亞洲之緊張？實大有疑問。第六，美國承認北平必阻礙中華民國對中國大陸的反共活動，對一向歧視為自由世界領導者的美國信用，亦必有所損傷。卡特新政府曾表明，尊重國際道義及加強與同盟國關係，但此種表示究竟是否是美政府的真正決心？卡特政府對中華民國之態度，將為一試金石。

四、「日本模式」與「德國模式」

美國如不顧前述之分析仍將尋求承認北平時，將以何種方式最為現實？對此吾人必須指出「日本模式」對美國並不適宜。因為美中（共）關係正常，採用「日本模式」，必須與中華民國斷交及廢除中美協防條約，承認臺灣為中共一部分，同時又與中華民國

非正式通商及維持經濟關係。但美國與日本立場完全不同，日本既非超級強國，亦非全世界各種安全保障條約的領導國家，且日本之能採取所謂「日本模式」，實因當時中華民國有中美條約之軍事支持之故。如美國沿用「日本模式」，廢除中美條約，中共為奪取臺灣，控制臺灣，必將不惜使用一切手段。換言之，美國若採用「日本模式」將使「日本模式」極簡易地破壞而失效。縱然中共與美國達成默契，對中華民國不行使武力，宣稱同意美國繼續對臺灣之安全持有莫大之關心，但其重量絕不能代替中美防衛條約，其拘束力亦值懷疑。

美國在能繼續保證中華民國的國際地位，進而亦不致使美國對他國條約信賴性受損情況下，承認北平，其方法祇有一個，即「德國模式」。

該模式是接受「一個德國民族和兩個政府」的東西德現狀，蘇聯在與東德保持現狀的情況下，與強調「德國祇有一個」的西德建立外交關係，此即所謂「德國模式」。換言之，如果此項模式適用，則美國始能承認中共，但美國與中華民國政府仍維持正式關係及中美防衛條約現狀不變。至於中共與中華民國共同堅持的「一個中國」，應屬他們的事，與美國無關，「一個中國的問題」如何解決，則委由中國人本身予以處理。

此種方式與美國在上海公報所表達的意思一致，因美國在上海公報中表示「美國承認臺灣海峽兩邊中國人所主張的中國祇有一個，臺灣為中國一部分，美國政府對此立場無異議，但美國對中國人自身以和平方式解決臺灣問題，重申具有關心」。美國如能使中共接受「德國模式」與中共接近，則不僅有大幅度的減低刺激美蘇關係的可能性，更可證明其對同盟國為嚴守國際信義的國家，因此而提高的美國聲望，更有助於美國中共外交的立場。

總之，美國如單方面廢除與中華民國的防衛條約，誠如紐約時報一九七五年六月十七日社論中指出「美國將開始逐漸滑向下坡」。與中共之交涉，忍耐為外交祕訣。日本對美國之所以如此強調，絕非單為日本本身的國家利益，同時更願透過亞洲的安定，對維持世界和平有所貢獻，但願吾人均能有此認識。